

# REMEMBRANCE

#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记忆》267期

## 北京高校文革专辑（31）

### 【专稿】

俞小平 事实与逻辑之三  
——答宫香政同学的《谎言止于真相》

### 【评论】

王复兴 评一份史料：《号外》  
——兼议文革时期北大武斗

胡宗式 评《号外》  
——北大武斗的背景和“井冈山”的立场

### 【人物】

舒 声 士可杀不可辱  
——心理学教授沈迺璋之死

樊能廷 北大文革“老佛爷”聂元梓（节选一）

### 【述往】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  
——逃犯·疯女·乞丐与列车员（20）

### 【文摘】

佚名 大英雄，真名士——北师大教授石盘

### 【编读往来】

1. 樊能廷：致乔晞华（对《记忆》的意见）  
方惜辰答樊能廷先生  
附录一：章铎谈樊文的抄袭（摘录）  
附录二：樊能廷答章铎
2. 魏明：对《记忆》266期读者吴兴月来信的疑问  
方惜辰答魏明先生

### 【本刊声明】

【专稿】

## 事实与逻辑之三

### ——答宫香政同学的《谎言止于真相》

俞小平

《记忆》256期发表了宫香政同学的文章《谎言止于真相——答俞小平》（以下简称宫文）对发表在《记忆》251期上的我的文章《事实与逻辑之二》作了辩驳，宫文显然与我的看法有不相同的意见，在此我对宫文逐段讨论如下。

#### 一、关于“前言”

宫文中说：我进新北大公社总部八个月，前期搞宣传。1968年3月22日进“文攻武卫指挥部”，我只参与了“3.28—3.29”北大武斗的策划，是一线指挥员之一。“3.28—3.29”武斗使两派同学受到伤害，这是我唯一的错误。

由于年代久远，宫香政同学也许遗忘了一些文革中自己的行为。在樊能廷编《北大文革简史》<sup>1</sup>里记载了以下事件：1967年12月9日晚，时任新北大公社17团团长的宫香政带队到中关村的科学院印刷厂暴力殴打印制毛主席诗词集注的井冈山人，并损毁印刷品。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sup>2</sup>“1967年4月26日”条记录如下：

4月26日 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双方发生第二次大武斗。孙蓬一、高云鹏亲到现场指挥。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孙又下令攻占了25、27、17、18、19、20、21、22、23和24等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等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以宫香政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

4月26日武斗，新北大公社未能攻占井冈山占领的36楼，遂占领所有井冈山6座

<sup>1</sup> 樊能廷：《北大文革简史》1294页，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由于我引用的为此书的电子版，引文页号可能与纸版有1-2页的误差，下同）。

<sup>2</sup>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008。

楼周围的楼房，对井冈山楼群形成大包围。为了抵抗新北大公社的攻势，井冈山广播台的几个人员秘密策划，挖通30楼楼脚的校内通讯电缆，从五月初起监听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电话，有关信息作记录，重要信息录音。电话监听工程对井冈山抵抗新北大公社的围攻有重大贡献。这份电话监听记录在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后上交工宣队，现存北大档案部门，校方曾经派人整理过。文革后审查宫香政的专案组，根据这些材料对宫香政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行为做出的处分，证据确凿，无可否认。

胡志远、耿天彭、温标、樊能廷的《北大井冈山兵团“监听电话”纪实》

<sup>3</sup>记录如下：

小飙监听电话，亲闻宫香政在电话中自报名号“我是宫香政”，向34斋布置武斗有关事宜，但是现今手头没有记录本和录音带，时间和事件内容，都回想不起来了。宫香政现今说自己“武斗中，除了3.28—3.29，别的什么也没参与”，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谎话。“井冈山”的“监听电话工程”，在3.28、3.29后二十多天才“开张”，负责监听的小飙二人都说，“听到宫香政电话最多了，我们每次都记错名字，根据他的口音写成‘龚祥政’，或者详细的‘详’。始终不知道是‘官’，是香臭的‘香’。到现在也没见过这个人。武斗期间宫香政电话最多，倒是没听到聂元梓亲自部署武斗行动的电话。宫香政在北大武斗中，作为副总指挥，始终担负重大的武斗责任，现如今，他写一些矢口否认的文字发表，力图抹杀历史真相。

姜承永的《忆北大文革中监听校内电话行动》<sup>4</sup>中，记录了井冈山监听电话的始末。

电话监听记录到的事情很多，现在回想有印象的事还有：井冈山03纵队运进粮食蔬菜，公社调人冲击，井冈山派人保护；从公社内部通话中得知公社派人到校外抓捕井冈山的人，都及时报告总部设法营救；侦知新北大公社武斗行动参与最多的执行头头有宫香政、王刚、黄元庄等人；井冈山从人大运来变压器时，有人向新北大公社总部报告说井冈山运进来一门大炮。从人大运来100KVA变压器是我导演的短剧。

<sup>3</sup> 胡志远、耿天彭、温标、樊能廷：《北大井冈山兵团“监听电话”纪实》，《记忆》207期，2017年12月15日。

<sup>4</sup> 姜承永：《忆北大文革中监听校内电话行动》，樊能廷：《北大文革简史》第1300~1305页，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

根据以上证词，在3月底到7月底的120天大武斗中，宫香政所谓“3.28—3.29”武斗使两派同学受到伤害，这是我唯一的错误。”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北大文革武斗中对北大井冈山兵团成员及非井冈山、非新北大公社成员的残酷迫害，请读者参见以下我发表在《记忆》上的文章：

《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载于《记忆》152期；

《真相的迷雾——答章铎校友》，载于《记忆》172期；

《事实与逻辑——就北大武斗答宫香政同学》，载于《记忆》190期；

《事实与逻辑之二——与宫香政同学的再讨论》，载于《记忆》246期。

## 二、关于“北大‘反聂派’的兴起，是‘由于聂元梓的专横跋扈不能容人’吗？”

关于这个问题，北大两派已经有很多文章讨论，我没有新的看法。北大反聂派的兴起，当然不仅仅是“由于聂元梓的专横跋扈不能容人”，而是有多种原因：聂的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干部、教师和学生，野心勃勃，到处夺权，想在北京称王称霸等等。请读者参见以下文章：

魏明，梁珊：《北大文革中两派分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兼评宫香政的文章“谁之过”》，载于《记忆》164期。

陈子明，林爻：《北大文革两派分裂，源自人心向背——兼与宫香政商榷》，载于《记忆》172期。

舒声：《北大校文革二组整了哪些“黑材料”》，载于《记忆》174期；

舒声：《试论文革中整学生的现象及其根源——以北京大学为例》，载于《记忆》175期。

## 三、关于“谁在为王关戚摇旗呐喊？”

宫文的第3段的标题问：“谁在为王关戚摇旗呐喊？”请读者来看看谁在为王关戚等中央文革新贵们摇旗呐喊。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1967年4月1日登载了如下消息<sup>1</sup>：

1967年4月1日《新北大》第57期，第一版，《陈伯达、戚本禹同志来校召

<sup>1</sup> 北大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

开座谈会并作重要指示》：三月二十七日下午，陈伯达和戚本禹同志来我校召集革命，师生代表就当前教育革命的问题举行座谈会，并做重要指示。座谈会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会上气氛热烈，到会代表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励。当晚，校文革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了首长的指示，并于二十八日上午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做了传达。在传达会上，掌声如春雷滚滚，全校一片欢腾。二十九日，校文革就如何贯彻执行中央首长的新指示作了具体部署。连日以来，全校革命师生纷纷组织联络站，举行大大小小的讨论会、串连会，决心以实际行动认真贯彻中央首长的指示，把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67年4月1日《新北大》（同日两期）第58期，第一版通栏标题文章《本刊三月三十一日讯：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是向刘、邓黑司令部发起总攻击的进军号——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新北大革命师生员工万众欢腾热烈拥护》。

1967年4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数力系战斗团七支队《热烈欢呼戚本禹同志发表重要文章》：“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是一篇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檄文，他向我们吹响了向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发起全面总攻的进军号，同志们，冲啊！杀啊！”

1967年4月8日，《新北大》60、61期合刊，第一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动员令》：“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是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章。公社和总部号召全体战士“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坚决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批倒批臭！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1967年4月8日《新北大》第60、61期合刊第一版，本刊讯《高举革命批判大旗，挖掉修正主义总根子》：“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之际，在向刘邓发起总攻击的进军号——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四月四日，我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举行万人誓师大会，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

第一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动员令》：“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是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章。他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发起总攻击吹响了新的进军号！”

第二版《孙蓬一同志讲话》：“戚本禹同志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就是这场决战的冲锋号角，向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司令部发起总攻，彻底清算刘少奇、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我们今天的大会就是执行最高命令，投入大决战的动员大会，就是刀出鞘、枪上膛，夺取新胜利的誓师大会！”

宫香政同学，你还要看更多的《新北大》校刊上登载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遵从陈伯达、王关戚等人的动员令的文章吗？根据以上当年《新北大》报的报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对戚本禹的热烈拥护，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也从王关戚代表的中央文革那里获得慷慨大方的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是康生派人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的。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同版刊登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王力与关锋起草、陈伯达定的标题<sup>1</sup>。没有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诸公的支持，聂元梓能像闪电般在一夜之间就红遍全中国，没有经受文革初期的任何挫折就成为文革中最著名的造反派巨星吗？

相比之下，王关戚出席过井冈山兵团任何一次集会吗？王关戚有过任何一次表态支持井冈山吗？事实证明王关戚始终视井冈山如无物！然而聂派们声称，在4月8日《新北大》发表长篇累牍高调欢呼、拥戴戚本禹文章4天之后的4月12日，“孙蓬一同志”向王关戚“宣战”了，居然这一宣战对象是谁都没有指明。遍览《新北大》报，在王关戚倒台之前，没有一个字的声讨指明向着王关戚。什么是宣战？宣战就是点名挑战，不点名还叫什么宣战？当王关戚奉毛泽东的指令大力支持聂元梓的时候，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为什么要反对王关戚？也许聂元梓对中央文革诸公对她的批评有所不满，私下里发发牢骚，但是当王关戚在中央文革红极一时的时候，聂元梓、孙蓬一哪里有胆子真的去反他们？头一个在1968年3月24日大会上公开领头高呼“打倒王关戚”的，正是王关戚的昔日顶头上司江青，而江青正是聂元梓的提线人和毫不掩饰的保护伞。

宫文引我的文章说<sup>2</sup>：“（俞文说）当反聂派尚未联合成为井冈山兵团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诸公就开始以反聂派支持王力、关锋、戚本禹为罪名，攻击反聂派和后来的井冈山兵团。”如果真像俞文所说的那样，新北大公社早就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而垮台了。

果真如此吗？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没有在井冈山兵团建立以前攻击过井冈山吗？

<sup>1</sup> 朱悦鹏：《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炎黄春秋》杂志1994年第7期。

<sup>2</sup> 宫香政：《谎言止于真相——答俞小平》，《记忆》256期，2019年5月31日。

读者们请看，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1968年5月9日第一版登载的以下文章<sup>1</sup>：

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

在“一月夺权”中，牛辉林怀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开始投靠王关戚反党阴谋集团。

六七年三月份，牛先后向反党阴谋集团的重要成员洪涛、徐非光等人汇报北大情况和反聂计划，王关戚反党集团对牛十分赏识，并给专门指定了三个和牛辉林联系人，积极为牛向反党集团转报材料。从此，牛就以“红旗飘”的头头、反党集团的一员开始了有领导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

……六七年五月，反革命分子洪涛向反党集团介绍北大“飘派”时说：“‘飘派’有四十几人，战斗力很强。‘飘派’特别注意保密，都是单线联系，许多人彼此还不认识。‘飘派’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和北大这一仗，在北大内部主要靠‘飘派’”，“我们坚决支持‘飘派’”。……

上面引用的文章所说的用来诬陷牛辉林与王关戚联系的日期，在1967年1月、3月、5月，而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1967年8月17日成立的。宫香政同学，请仔细阅读我所引用的《新北大》报有关文章，请指明我所说的“当反聂派尚未联合成为井冈山兵团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诸公就开始以反聂派支持王力、关锋、戚本禹为罪名，攻击反聂派和后来的井冈山兵团。”错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的井冈山兵团总部的立场，我询问过当年的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组长侯汉清，侯汉清说<sup>2</sup>：“在王关戚的问题上，老井和聂公社没有大的差别。我没说王关戚都不是问题，应该属于干将、打手。在中央公开批判王关戚之前，两派都是公开支持的。但是公社他们自1966年以来一直紧跟江王关戚，听命于他们，批邓，批朱，搞乱上海，抓叛徒等等。至于后期他们之间发生一些矛盾，聂孙会产生一些想法，也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借此想自封为反对王关戚的英雄，把我们打成保王关戚，那是徒劳的（连宫自己的文章都说聂孙也不敢公开反对王关戚）。正如老井内有一些人对江青、陈伯达等有看法，绝对不能因此就说老井当年是反对江、陈，反对中央文革的。”

<sup>1</sup> 北大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

<sup>2</sup> 俞小平：与侯汉清的电子邮件，2019年6月2日。

#### 四、关于“发动武斗是为了自保吗？”

在宫文的第一段和这一段里，宫香政承认3.29武斗是他与新北大公社其他骨干一起策划的，但是又声称井冈山在新北大公社于31楼发动武斗前占领了40楼：

3月28日晚上，井冈山兵团派出武斗队，占领了40楼，抓捕该楼里30名手无寸铁的公社成员（包括红十团团长）。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万万没有料到，新北大公社会在深夜进行反击，采取中心开花战术，夺占了31楼。双方混战一场。

井冈山兵团住在31楼的成员樊能廷、李憧、张曼平、耿天彭等人都在他们自己的回忆录里证实3.29武斗是公社武斗队准备充分的突然袭击。从上面这段文章，可以看出宫香政对新北大公社这一段突然袭击的战术的成功多么得意，时至今日还能洋洋得意地称之为“中心开花”。3.29武斗那么多同学受伤，被赶出宿舍无处存身，有些人所受到伤害终其一生，北大的大武斗从此揭幕，延续四个月之久。更多的人因新北大公社包围井冈山的武斗而受伤，三个无辜的学生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杀害。宫香政在他的文章里说“3.28—3.29”武斗使两派同学受到伤害，这是我唯一的错误。”却没有一个字的道歉。

宫香政及其他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骨干，拿不出即使一个新北大公社成员的证词来证实宫所说的，所谓“40楼（的武斗）是井冈山在31楼武斗发动前发生的”。宫香政甚至搞错了在40楼预谋拦截井冈山五一纵队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单位，他们是东语系郑雄率领的东语系09团，不是宫所说的西语系“红十团”。

我这里有一份新北大公社成员陈景贵的证词<sup>1</sup>：

26楼一楼没有设防，尚能群众居住。佟仁杰回来说对在40楼手执长矛大刀牵制五一纵队的做法有意见，所以没有参加牵制行动。“你就真忍心往下扎？！”他这样说。

在一篇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印发的号外里，记录了新北大公社东语系09团团长郑雄的证词<sup>2</sup>：前天开会，黄元庄布置武斗，今天中午又开会。我们九团的任务是控制井冈山五一纵队，不让他们下楼。

<sup>1</sup> 陈景贵：《1965—1970 那几年我在北大》，第845页，香港人民出版社，2019年。

<sup>2</sup>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号外，1968年4月5日。

井冈山兵团成员王书仁有如下证词<sup>1</sup>：

3.29 武斗的另一个主要战场是 40 楼。40 楼一楼住的东语系学生，二楼俄语系，三、四楼西语系。当时井冈山兵团西语系的“五一纵队”实力较强，新北大公社总部为了阻止五一纵队前去 31 楼救援 03 纵队，就让住在 40 楼一楼的公社派东语系的 09 团，预先在 40 楼的一、二楼之间的楼梯上构筑工事，用座椅堵塞楼梯，阻止五一纵队下楼。五一纵队在纵队长石磊和杨玉海的率领下，向下勇猛冲击。身为复转军人的杨玉海用手举起一辆自行车作为盾牌，挡住 09 团投来的密集石头，冲了下来。经过激烈战斗，09 团退缩到一楼的西侧楼道无路可逃，大约有 30 多人被俘，被五一纵队关押在一楼的西侧的两个房间内。半个小时后，由于看守不严，逃走了 7~8 个人，余下 26~27 个人，在天亮时被押送到 28 楼井冈山总部。

以上两份新北大公社成员和一份井冈山成员的证词都证明，3.29 凌晨发生在 40 楼的武斗，是新北大公社事先预谋的武斗计划的一部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在 31 楼按预定计划攻击井冈山化学系 03 纵的同时，40 楼的新北大公社东语系 09 团已经在 40 楼一、二楼之间的楼梯上构筑工事、阻拦不知情的西语系井冈山五一纵队下楼的去路。

## 五、关于“也谈点‘事实与逻辑’”

宫文中引用我的论点如下：

俞文说：“毋庸讳言，文革后清算文革中的罪行和三种人确有政治倾向。同样的罪行，在政界有背景的逃过去了，没有背景的只能去坐牢。但是如果你没有犯罪，没有伤害人命，谁能把你送入牢房？”判了刑就有罪吗？地质学院王大宾，就是因为陈云的一句话，就被判了九年！“五大领袖”中跟“四人帮”最紧的是谭厚兰，她带人到曲阜砸孔庙，是政治问题，也是刑事问题，但却免于起诉。文革中被处死的遇罗克、林昭、沈沅有罪吗？

<sup>1</sup> 王书仁：《北大地球物理系部分校友忆武斗》，《北大文革武斗纪实》自印本，2018。

没错，我在上文中说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犯罪，没有伤害人命，谁能把你送入牢房？”这里澄清一下：我所说的“你”，专门指你宫香政同学，并不泛泛涉及其他任何人，更不包括遇罗克、林昭这样的专制制度下牺牲的伟大的精神先驱者。

宫文中接着说，俞文说：“在新北大公社的武斗据点里，关押过多达数百人的北大师生。”这种说法有事实根据吗？数百人关在武斗据点，看管的人是否也要有数百人，这是大客栈，还是武斗据点？

宫香政同学的逻辑是：被关押的被俘师生与监管人员的比例必须达到1:1，否则管不住人，以此逃避新北大公社在武斗期间关押数以百计的井冈山人的责任。这话的逻辑缺乏事实依据。我有如下的亲身经历：1968年4月29日在28楼我看到在40楼武斗中失败被俘的新北大公社09团约30人，包括团长郑雄，被关押在一个房间里，门口有3个人看管。被俘人员与监管人员比例是10:1。

另一个相关文献是《北京大学纪事》的有关记录<sup>1</sup>：

5月16日 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218名。“监改大院”设有监改人员二十多名，仍由历史系学生刘国政任总负责人。不少监改人员打人成性，院内气氛阴森凄惨。

上文的记录里所载的“犯人”和“狱卒”的比例也接近10:1，可见我的经历所言不虚。宫香政的被关押人员和监管人员必须达到1:1比例之说不攻自破。

从双方在卫戍区的监督下交换3.29武斗的被俘人员，直到7月底武斗结束，井冈山兵团只抓过两个人，我已经在我的回忆录《做人的底线》里说得清清楚楚。对于戴新民，我已经在上面的回忆录里表态道歉。我系留校同学俎栋林在1980年亲自向戴新民当面道歉，戴新民回答说<sup>2</sup>：“不必，井冈山是保护了我，不然，我就遭大难了，……”

1968年8月19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进北大接管权力，宣传队下令双方移交所抓对方的“战俘”。新北大公社移交23名被关押者给井冈山兵团，这个数字不包括被移交给宣传队继续关押的人员。井冈山没有移交给新北大公社人员，移交给宣传队一人：戴新民，在继续审查数月后释放。

<sup>1</sup>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2008。

<sup>2</sup> 俎栋林：微信，2016年3月9日。

在宫文的这一段里，宫香政一共提到被井冈山抓捕过的四个人。

第一个是崔雄崑，宫文中说：

事实是，1967年12月30日井冈山兵团抓走了北大教务长、校文革结合的干部崔雄崑。直到1968年元月6日(在卫戍区的一再干预下)才放人；。

侯汉清在电子邮件里说<sup>1</sup>：

借林彪女儿之事抓崔雄崑到农大关押，是总部决定的，是一个因派性而采取的  
错误行动。正如17纵抓戴新民一样，尽管戴后来还感谢我们，但此行动明显  
是错误的。我当时没去过农大，不知详情。好像崔当时没有挨打受伤。

我也认为，井冈山兵团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派性的行为，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崔雄崑在被井冈山人员关押期间未被刑讯逼供，崔对井冈山人员的问话一言不发，毫发无伤，井冈山人员对他也无可奈何，在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的干预下只好放了，送回校文革办公室。

井冈山兵团抓崔雄崑并非毫无缘由。《北京大学纪事》“(1967年)12月3日”条<sup>2</sup>：

12月3日 “新北大公社”红卫兵从南口将戈华抓回北大。

戈华是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当时亮相在井冈山兵团一边，惹火了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新北大》报多次诬称“戈华是井冈山的黑高参”。戈华在外地逃难三个月，也没能逃脱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围捕他的罗网，终于被抓回北大投入监狱，严刑逼供。

新北大公社成员扬子浪的《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中这样说<sup>3</sup>：

12月10日 这几天北大空气十分紧张，小摩擦、小武斗不断发生。公社对井冈山叫嚣的十二月风暴警惕很高，甚至有些精神过敏。12月9日的大规模行动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造成了把积累已久的政治优势丧失殆尽，反主动为被动

<sup>1</sup> 俞小平：与侯汉清的电子邮件，2019年6月2日。

<sup>2</sup>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008。

<sup>3</sup> 扬子浪：《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华夏文摘》增刊第九六一期(zk1410a)，2014年10月6日。

了。昨天中午，公社几千人，在几个校文革老爷的指挥下，蜂拥而去，包围了25楼。以牛辉林之流包庇反革命为题，揪斗、殴打了牛、侯、谢记康等人。并把这三人带走，在大饭厅又进行殴打、斗争。后来骑虎难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送往公安局，但后来被井冈山劫走。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的小武斗。井冈山做大做宣传文章。俨然一副从困难环境中摆脱出来的模样。显然，聂、孙等人参加了12.9事件。孙蓬一甚至主张攻打28楼（王复兴说），难道能用盲动来解释他们的行动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1967年12月9日新北大公社暴力攻击当时位于25楼的井冈山兵团总部，抓捕、殴打井冈山侯汉清、牛辉林等负责人的行为当时震动北大全校。在侯汉清等被井冈山成员救援出来以后，我参加了大饭厅井冈山兵团对新北大公社暴行的控诉大会，亲眼目睹侯汉清身穿被撕烂的大衣，面部流血，愤怒地控诉了新北大公社的暴行。与宫香政同为新北大公社成员的杨子浪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也是我的问题。宫香政同学，你能否在这里回答呢？

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后，于1967年12月3日从南口抓捕了逃难中的戈华，押回新北大公社的据点，刑讯逼供；12月9日借故挑起事端从25楼绑架井冈山头头侯汉清和牛辉林，一路殴打，拉到大饭厅后继续殴打；当晚宫香政率队到中关村科学院印刷厂践踏、毁坏井冈山印制的《毛主席诗词集注》，还打了在那里工作的井冈山的学生；12月21日深夜，上百名新北大公社工人和学生，深夜闯入位于燕南园的周培源先生的住宅，企图抓捕周培源，幸而周培源被井冈山兵团总部秘密保护，已经离家，才得以逃脱被抓捕关押的厄运。新北大公社人员冲砸抄家之余，还抢夺古玩字画，打伤周先生的妻女。周培源是中央明令保护、不得冲击的全国仅有的几十个重要科学家之一，名列周恩来的保护名单，仅仅因为周培源加入了井冈山兵团，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竟然对周培源抓捕、冲砸、抄家。聂元梓、孙蓬一之流无法无天到何等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报复，井冈山人员以崔迫害林立衡为由绑架了崔雄崑。宫香政同学，在我提供的这些资料面前，你打算怎样评价这个事件？

第二个，宫文中说：3月17日绑架广播台的编辑贾瑞珍（中文系学生），在28楼毒打及审讯；

关于此事我毫无了解，暂不予评论。

第三个，宫文中说：1968年3月28日武斗时，住在40楼的公社胜利团东语

系学生王明美等人被井冈山关押到 28 楼。王明美在被关押时头部被铁棍砸伤、流血，不得不在凌晨被送往积水潭医院抢救。

上面所说的王明美，我没有与他相关的信息。首先我要声明，这次武斗是在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 1 点钟，在校文革策划下，由新北大公社钢一连等武斗队在 31 楼向睡梦中的化学系井冈山 03 纵队发动进攻时开始的。由于当夜我正巧在 28 楼井冈山兵团总部参加值班，因此我完全清楚，在 3 月 29 日 1 点以前，北大校园一片寂静，学生宿舍区并无任何武斗发生。3 月 29 日 1 点钟，住在 31 楼的井冈山同学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攻击，逃到 28 楼井冈山总部告警以后，井冈山广播台向全校广播，呼吁井冈山成员前往总部所在地 28 楼集合，以期救援 31 楼的井冈山成员。住在 40 楼三、四楼的井冈山西语系五一纵队听到广播后集合下楼，在一、二楼之间的楼梯口被住在一楼的新北大公社东语系 09 团武装拦截，五一纵队为自保不得不冲击下楼，09 团战败，约 30 人被俘。其事证据见本文的“第 4 段关于‘发动武斗是为了自保吗？’”我很遗憾 09 团的人被打，但是在井冈山被校文革事先策划、新北大公社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新北大公社在 40 楼的武斗队员被打的责任不在井冈山，而在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武斗策划、指挥人员，包括自己著文承认参与策划和指挥其事的宫香政同学。

第四个，宫文中说：抓捕、批斗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戴新民，并关押在 28 楼长达数月，被你们放出来时，我恰好遇见，她已成了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白毛女”。

对于戴新民，正如前文所说，井冈山成员已经向她道歉。我在 2016 年向技术物理系相关同学调查过此事，抓捕戴新民是技术物理系井冈山 17 纵的计划和行动，审查她的专案组也是 17 纵设立的，井冈山兵团总部事先未涉入抓捕计划，事后也未参与她的专案。在戴被关押期间，我与她住在 28 楼的同一层楼。我负责地对此事作证：在戴新民被关押期间，井冈山没有对她作任何批斗行动，一次也没有。

我们再来看看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怎样预谋策划、迫害井冈山兵团成员和北大干部和教师的。《北京大学纪事》“1968 年 4 月 26 日”条<sup>1</sup>中记载：

（1968 年）4 月下旬 聂元梓、孙蓬一下令组成“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个专案组，研究抓这三个组织中的“反动小集团”。专案组先后抓捕颜品忠、韩琴英、徐运朴、王忠林等十余名师生，进行严刑审讯和逼供，孕妇韩琴英被打流产。

<sup>1</sup>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2008。

4月 校文革将我校一百三十余名干部集中成立“劳改大队”，送到昌平太平庄关押、劳动。劳改大队以历史系学生刘国政为总负责人。

5月16日 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218名。“监改大院”设有监改人员二十多名，仍由历史系学生刘国政任总负责人。不少监改人员打人成性，院内气氛阴森凄惨。

6月27日 “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表《关于彻底砸烂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第三号公告》。《公告》将原“红旗飘”的九个学生点名定为“现行反革命”或“骨干分子”，说，这是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必须坚决镇压”。

7月4日 “新北大公社”总部召开“批斗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大会，将徐运朴、牛泰升、王明德等三个学生揪上台批斗。

7月18日 校文革召开“首次公审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大会，审讯三个学生。

1968年3月27日，校文革预谋策划绑架了樊立勤，新北大公社对他日夜酷刑拷问，其残忍程度直逼所谓的国民党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就不载入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里登载的迫害井冈山人员的文章，那里面不打自招地例举了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当时迫害的众多师生员工，准备再迫害哪些人，其名单历历在目。

宫香政同学关心被放出来的、被关押期间没有挨过打的戴新民“走路晃晃悠悠”，是否能够也关心一下那些被抓捕、关押、刑讯逼供、打得头破血流、打断腿骨、孕妇被打得流产的、被新北大公社开批斗会、被迫写认罪书的井冈山兵团成员呢？宫香政同学，你要我为他们列一个受害者的名单吗？

## 六、关于“关于牛辉林同学”

宫文中说：

俞文问：“牛辉林有什么罪？”牛辉林同学已作古，“死者为大”，我本意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作者一再提及此事，并且一而再，再而三要我与其论战，我不得不再说几句。

我在《记忆》所发关于北大文革两派斗争的四篇文章，见第一段“1. 关于‘前言’”前三篇都没有提及牛辉林，只是因为宫香政在《记忆》234期刊发的《论“政治倾向性”》里用讽刺的口吻挖苦牛，我才在《事实与逻辑之二》里第一次为牛辩护，宫香政说我“一再提起此事”，证据在哪里呢？

宫香政同学挑剔我称牛辉林与邓朴方为“难友”。他们二人都受过校文革和宣传队的迫害，以此而论，称他们为难友并无不当。我不认为宫香政有权干涉我称他们为难友的权利。

至于宫香政同学在宫文的本段中，端出一些文革后某些人对牛辉林的无聊人身攻击，与北大文革毫不相干，这就是宫香政所说的“死者为大”吗？这样干是不是太不讲做人的道德了？

### 七、关于“关于六十三军”和古柯的“从‘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说起”

宫文中在此一段中，否认63军违背公平原则，继续迫害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迫害过的北大师生员工。我们还是看看以下文件是怎么说的：

在题为《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的北大宣传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里<sup>1</sup>，其中有一段说：

由于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没端平”，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造成扩大化，客观上起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作用，致使两派群众在思想上的对立，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那么是谁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没端平”呢？报告后面接着说：

当时，进驻北大的八三四一部队遵照毛主席“谦虚，谨慎”、“做群众的小学生”的教导，和原驻校四五八七部队宣传队拧成一股绳，不分你我，尊重兄弟部队，学习兄弟部队的长处，共同宣传毛泽东思想，落实政策；既积极参加领导，又不是包办代替；对四五八七部队在前一段工作中的成绩充分肯定，并虚心学习，对缺点错误，经过调查研究，也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提出，热情进行帮助；有不同看法在领导内部谈心，统一认识，并且完全相信兄弟部队能够改正前进中的

<sup>1</sup> 北大宣传队：《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1969年7月17日；中发[1970]17号《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1970。

错误，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四五八七部队对八三四一部队热情欢迎，并看作是对自己的支援；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重视缺点错误，勇于作自我批评。

报告中的四五八七部队是63军的番号，在北大习惯称为63军；八三四一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番号，在北大习惯称为八三四一部队。1968年8月至1969年3月间，63军领导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主政北大，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大搞政治迫害，立案九百多个，支一派压一派，弄得北大运动无法收场，毛泽东不得不派遣自己的心腹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进驻北大，来替63军收拾烂摊子。在八三四一部队的指导下，63军不得不检讨自己的错误，把被关押的人放出来，把诬陷的迫害材料当着被害人的面销毁，这些都是我当时亲眼目睹的。报告下面接着说：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宣传队的同志在学习班里，在大、小讲用会上，谈心得体会，主动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

这就是说，63军做了“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什么责任？就是前面报告中说的：

由于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没端平”，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造成扩大化，客观上起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作用。

报告在下面接着说：

校文革是一九六六年九月，根据“十六条”精神成立的。在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组织革命大串连等，曾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运动的中、后期站在“公社”一边，形成了一派掌权。他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实行所谓“亲我则亲，冷我则冷，打我则打，反我则反”的原则，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对立面革命群众组织采取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摧垮的方针，把对立面组织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操纵的保守组织”。

校文革对人民内部既无真正的民主，对反动派又无有效的专政。其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造成继续分裂的局面，以致发生武斗，搞逼、供、信，严重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校文革在运动中、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后来，虽然在组织上联合了，并且在基层成立了有两派群众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没有纠正原来一派掌权的错误，使两派群众仍然没有消除对立情绪。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还是不能落实，斗、批、改不能顺利进行。

这个报告说，在校文革掌权后期，校文革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63军领导的宣传队主政北大后，“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压”北大井冈山兵团。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里我要谈谈古柯的《从“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说起》<sup>1</sup>。

这篇文章提到文革中的两个军，38军和63军对北大两派的态度。38军支持井冈山兵团，63军支持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文革中的北大是人所共知的事。毛泽东也知道此事，以至于在7.28召见北京高校五大领袖时明确指出。可以肯定的是，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仅止于口头支持，该军并无任何实际的支持井冈山的行动。而63军介入北大文革极深，几次负责北大军训，在宣传队主政北大初期，更是在清理阶级运动中大打反革命集团，犯下严重的错误，干扰了毛泽东结束文革乱象、收割文革胜利果实的大战略，以致在1969年3月后被毛泽东派八三四一部队夺权并公开检讨。见本段前面引用的北大宣传队报告《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

38军支持了北大井冈山兵团也罢，没支持北大井冈山兵团也罢，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可是古柯居然在他的文章里说：“文革发动50年后，俞文再提38军支持井冈山这个伪命题，是给人民军队抹黑！”<sup>2</sup>这个问题大了。

韩爱晶在《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里记载如下<sup>3</sup>：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对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应该去做38军的工作。”

<sup>1</sup> 古柯：《从“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说起》，《记忆》193期，2017年8月31日。

<sup>2</sup> 古柯：《从“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说起》，《记忆》193期，2017年8月31日。

<sup>3</sup> 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共识网》，2013年11月18日。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做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坏。”

古柯在他的文章里昧于历史事实，说我从2017年（古柯发文的年头）穿越到1968年“给人民军队抹黑”，我也无可奈何。可是上文中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38军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坏”。对驻守在北京南大门保定的精锐部队38军，毛不得不为之在聂元梓面前说好话，可见聂元梓说了38军的坏话。什么坏话？我在这里推论一下，是说了井冈山勾结38军干了什么坏事吧？文革最热门的造反派头目聂元梓要找38军的麻烦，以至于38军领导人矢口否认与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任何关系，竟然敢否定毛泽东认为38军与井冈山有关系的话：“如果对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应该去做38军的工作。”请古柯找出毛泽东给人民军队抹黑的证据，然后再来找我算账如何？在毛泽东召见21天后，毛还是派了63军到北大，是不是因为“你们讲的那么坏”，毛竟然不太相信38军了呢？从结果来看，派遣63军主政北大显然是失败的，否则毛不会在7个月以后改派八三四一部队来北大收拾残局。

古柯的文章更为63军主政北大时期整了九百多个专案竭力辩护，称为是“形势使然”。可是为什么在八三四一部队进校后，撤销了绝大部分专案，所整的材料当众销毁？这又是什么样的“形势使然”？

古柯为宣传队逼死二十多条人命辩护，说“这是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sup>1</sup>”

在此我介绍我班的具体实例如下：

我班是技术物理系的一个班，在文革中很活跃，全班50人，三分之二同学是井冈山派，1969年初，我班已有四个同学被隔离审查、秘密关押。由于大多数同学的抵抗，清查运动进展困难。系宣传队派了一位得力的工宣队员来我班主持运动，来的当天就奉命宣布另外两个同学隔离审查。当他在同学中做了详细调查后，向系宣传队力争，并在第二天取消了前一天宣布的隔离审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与我班同学相处融洽，极力压住极少数同学力图扩大打击范围的势头。系宣传队对他甚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我们多达五位同学得以逃脱被审查的厄运。这四个已被关押审查和五个被列入审查名单的同学，其中七个是井冈山派的，二个是非新北大公社派、非井冈山派的，没有一个是新

<sup>1</sup> 古柯：《从“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说起》，《记忆》193期，2017年8月31日。

北大公社派的。显而易见，在我班的审查名单是以派性划分的。八三四一部队进校后，被关押的同学都被释放，审查专案撤销。我班的同学都感谢这位工宣队员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大恩大德，这位工宣队员是一个有人性的人，是一个大写的人。

所以即使在普遍的恶劣形势下，一个人还是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做坏事、甚至救护陷入厄运的人的。即使当年逼死人命是形势使然，如今五十年过去了，这些做了残酷的坏事、迫害以致害死人命的打手们，不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忏悔当年的罪行吗？

## 八、关于“也谈给井冈山兵团的定位”

宫文在这一段里例举了“公社对井冈山的称谓”和“井冈山对校文革、公社的称谓”，以此证明两派在互相称谓上并无区别，宫香政同学的这个结论没有错。井冈山一些成员称聂元梓为“破鞋”，称新北大公社为“鞋社”，是嘲笑对方以求心理平衡的无聊勾当。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明，在北大文革中发生的事实证明，井冈山人无论如何口出恶言，也不过止于口头恶言而已，对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并无实质性的伤害。冲会场两派都干过；抢档案、抄二组是因为他们整了学生、干部和教师的黑材料；抄家的事，校文革的本事比井冈山大出百倍。井冈山与新北大公社在文革中、特别是武斗时期完全不能相比。

权力：聂元梓和校文革以权力机关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发正式文件，诬陷井冈山头头侯汉清、牛辉林、徐运朴等人为现行反革命，使他们的家属受到当地政府或造反派的残酷迫害。据不完全统计，校文革在北大校内、北京市内、以及全国各地，抓捕了以下井冈山成员和非井冈山非新北大公社成员，押回北大关押、酷刑审讯，多位成员被打伤，甚至终身不得痊愈（这份名单不包括那些不愿名列其中的人员，也不包括被关押在劳改大院即牛棚里的人员）：<sup>1</sup>

杨勋、杨炳章、魏秀芬、杨作森、乔兼武、何维凌、胡定国、戈华、谢世扬、胡根初、王海、王培英、苏士文、余水荣、臧希文、王晓秋、赵长占、刘立炎（以上人员在1968年3.29武斗以前被抓）；

徐运朴、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等“红旗飘”骨干成员；樊立勤、韩琴英（何青）、彭秋和等“东方红”骨干成员，在丰台火车站设伏抓捕肖正贵、俎栋林、施裕壬、钱某某、马国勋（只有肖正贵只身逃脱）；

郭青苔、俞小平、周XX、王解南、周国平、刘文建、蔡小海；

<sup>1</sup> 舒声：《北大文革中的抓捕行为》，《昨天》第121期，2018年11月30日。

邓朴方（以上人员在1968年3.29武斗及以后被抓）。

在北大武斗期间，在校文革的庇护下，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以暴力酷刑打死三人：温家驹、殷文杰、刘玮。

资金财产：两派完全没法比，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构，新北大公社能尽其所欲向校文革要现金要物资。后期阶段井冈山除了个人的工资什么也要不到，武斗时期有些井冈山人的工资、助学金、粮票等被校文革扣押，很多井冈山人不敢前往校系文革办公室领取这些必须的生活费用。

断水断电断粮断炊：新北大公社控制了全校水电来源，任意对井冈山楼群断水、断电，使井冈山人陷入艰难的困境，拦截井冈山运粮运菜车辆、在海淀殴打井冈山购粮人员，断电即同时断炊。

住房：武斗期间井冈山楼群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包围，很多井冈山同学只能逃往校外。

行动：新北大公社成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井冈山楼群里的人没有出入行动自由，动辄就会在马路上、街道上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去酷刑逼供，甚至被打死。

武斗武器：新北大公社的长矛是用后勤的无缝钢管原料批量生产的（因为管材涂有橘色防锈漆，很容易识别），护身盔甲是后勤仓库成批切割不锈钢板材加工的；井冈山的长矛是锯开楼内的暖气管做的（幸而是夏天不需供暖），胸甲是捡各种材料凑合的。

## 九、关于“官方笔下的北大文革”

宫文中说：

俞小平的态度与王效挺等人有相似之处。其在《记忆》上发表的所有文章里，同样找不到新北大公社向关锋的基层势力吴传启们进攻，找不到新北大公社反谢富治，更找不到井冈山兵团给校文革扣上的“二流派文革”、给新北大公社扣上“二流派公社”的说辞。北大井冈山与王、关、戚的关系，是否“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侯汉清早在1967年9月中旬，就对胡宗式讲了：“看来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

正如宫香政同学所说，我从来没有把新北大公社反吴传启当作什么重要事件，那不过是聂元梓等文革造反派们掌权以后争夺更大权力的争权夺利。你聂元梓是北大的造反

派，他吴传启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的造反派，吴传启的造反大字报比聂元梓大字报贴得还早，只不过攻击对象不是毛泽东的目标而没有用上<sup>1</sup>。双方没有什么对错可言。在北大校内，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之间都互相扣过很多帽子，这些帽子大多同样谈不上对错，互相骂战而已，骂赢了不是功劳，骂输了也不是耻辱。本文没有谈及新北大公社反谢富治，因为我没有在公开的文献上看到新北大公社确实的反谢言论。聂元梓对谢富治颐指气使，谢富治不能对聂发脾气，就因为聂元梓是毛泽东的文革新宠，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个签署人。毛泽东不让聂元梓倒台，谢富治就不能不支持聂。同样地，谢富治是毛泽东的忠实文革重臣，毛不发话，聂元梓也不敢公开跟谢过不去，以至于1967年4月12日孙蓬一讲演以后，当某些新北大公社成员听了孙蓬一的挑唆，上街贴谢富治的大字报时，聂元梓十分紧张，赶紧派人盖掉<sup>2</sup>。毛泽东不发话，聂元梓怎么敢公开反对文革重臣谢富治？没有中央文革诸公与谢富治的支持，就没有聂元梓校文革在北大的天下。井冈山不敢反谢，因为没有资本反谢。谢富治也罢，王关戚也罢，所有这些文革期间的中央大员，他们有一个给过井冈山好脸色，甚至与任何一个井冈山头头见过一次面、说过一句话公平的话吗？

宫香政同学大谈聂元梓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反对谢富治，抱怨我没有就反谢这一功劳表彰聂元梓校文革。读者们可以看看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关于谢富治在《新北大》报上到底说了什么。下面是《新北大》报有关谢富治的选登<sup>3</sup>：

1968年3月23日，《新北大》160期。同期第一版转第二版，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关于当前形势的严正声明》：

二、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坚决维护她的革命权威！目前社会上牛鬼蛇神，妄图搞垮市革委会，我们要给予坚决的回击！

……打倒刘邓陶！打倒贺龙！打倒谭震林！打倒刘邓陶的黑爪牙关王戚！谁为二月逆流翻案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sup>1</sup> 李海文：《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sup>2</sup> 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第99页，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

<sup>3</sup> 北大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期第三版，刊登《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sup>1</sup>：

三、毛主席支持我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身边的红色政权。她在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在率领革命人民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战斗中，担负着极其重大的使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维护她的革命权威！坚决打击阶级敌人妄图颠覆市革委会的一切阴谋活动。不管阶级敌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公开复辟也好，“孙行者钻进肚皮”篡权也好，我们都要坚决把他揪出来！

1968年3月26日，《新北大》第161期<sup>2</sup>。第一版，本刊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关怀新北大，谢副总理亲临我校做重要指示：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陪同一起前来的还有吴德、丁国钰同志。谢副总理说：我是和聂元梓同志一起来的。现在希望你们北大的两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同志的领导下，把大家联合起来。主要的矛头对准大叛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彭陆罗杨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联合起来，在校文革、聂元梓同志的领导下，向那些刘邓陶的爪牙、王关戚，还有周景芳这些变色龙、小爬虫，向他们作斗争！我们都要联合起来，北京的大学两派都要联合起来。外地、外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是错误的！所有外地、外学校的一律要退出北京大学。

同期第二版，刊登《在传达谢副总理在市革委上重要讲话的全校大会上，聂元梓同志的讲话》……我们坚决维护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绝不允许阶级敌人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

同期第四版，刊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常委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关于孙蓬一同志问题的严正声明》：……打倒北大井冈山黑后台！坚决揪出红旗飘里的坏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1968年3月30日，《新北大》增刊（共二版）<sup>3</sup>，第一版，刊登三月二十九日晚在

<sup>1</sup> 北大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

<sup>2</sup> 北大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

<sup>3</sup> 北大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

新北大《谢副总理温司令员李副司令员重要讲话》。

到目前为止，我在《新北大》上看到的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对谢富治的热烈拥护、无限支持，没有找到任何反谢的文字证据。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如今在北大图书馆里开架任人阅览，宫香政同学是否有兴趣下点功夫查一查，从创刊到闭刊，在多达200期的《新北大》上有没有一个字反谢？

宫文想要证明什么呢？新北大公社反潘梓年和吴传启、反谢富治，就自认为有功了吗？井冈山扣了新北大公社一个“二流派公社”有罪了吗？我并没有因为宫文中说了“井冈山兵团就是国民党，公社跟井冈山的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就认为公社犯了多大的政治错误。文革中各派之间给对立派扣帽子，打棍子，这是什么稀罕事吗？

至于宫文中所说的：侯汉清早在1967年9月中旬，就对胡宗式讲了：“看来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关于此事，我问过侯汉清，他对我说<sup>1</sup>：

说实在的，我不记得曾与胡宗式做过那次无头无尾无凭无据的谈话。胡、宫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表明他们50年来没有进步，仍旧是文革的思维，派性的思维。实际上，他们谁也拿不出老井总部和我个人曾公开支持王关戚的行动和言论的证据（当然不包括他们红极一时时，如王力在武汉事件后被捧为英雄，难道聂孙他们当时就敢公开反对？）至于井、红、飘等组织中个别人曾对社科院、高教部和民族学院个别群众组织和人物（据查，他们在文革后期均已获得平反并恢复名誉）的表态，只能视作当时他们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井冈山兵团总部的态度。

## 十、关于“结语：一句很到位的话”

宫文中说：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被毛利用，在全国掀起文革巨浪，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这是大字报作者们无法预料的。

如果聂元梓没有利用毛泽东的《五一六通知》，把她的政敌“陆平黑帮”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聂怎么会被毛利用呢，这不是聂自作自受吗？聂因为她在文革中的罪行，在文革结束后被打翻在地，不仅给国家、也给自己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无法预料的，有着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的延安老干部聂元梓不会不知道火中取栗的后果，这不过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罢了！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当权者不愿、甚至禁止民间回忆及批判文革，那些文革重灾区

<sup>1</sup> 俞小平：与侯汉清的电子邮件，2019年5月31日。

的亲历者仍然不断地写出回忆录及研究文章，具体单位的文革历史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厘清事实真相，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依据。有的人放大眼界，厘清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始作俑者的责任和罪行；有的人细致入微，理顺一个单位在文革中发生的具体事例；两者都是为了弄清文革灾难的来龙去脉，以警示未来。宫香政同学因为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文革、特别是武斗时期的暴行遭到揭发和批判，不但自己不知道忏悔以求受害者的宽恕，反而给人扣上“受害者不敢、不愿批判毛泽东”<sup>1</sup>的帽子，既不尊重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我们只要看看北京高校的文革重灾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五大领袖主政的五所大学，已经发表的成百上千篇回忆录和研究论文，绝大多数都是涉及的本校的具体的人和事，大家都视这样的行为理所当然，没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状况是“受害者不敢、不愿批判毛泽东”。宫香政同学用这种转移视线的方法掩护自己和聂元梓等人过关是徒劳的。

在毛泽东的政治战略里，聂元梓算得了什么？一个打手而已。想用用她，不想用丢弃。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权威达到无人可及的高度。连党内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当他与毛发生争执时，毛都能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sup>2</sup>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大员，只要触犯了毛，说倒就倒了，例如刘邓陶、彭陆罗杨、王关戚、杨余傅，个个是中共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大员，打倒他们何曾用什么阴谋？要废掉一个毛自己树起来的小小工具、12级干部聂元梓，居然需要拐那么大个弯搞什么阴谋，费尽心机在北大搞出一个井冈山兵团来。

如今按宫香政的说法，井冈山兵团就是毛造出来打倒聂的工具。宫文中说：

在毛看来，王关戚是中央文革的少壮派，是他推进文革极左路线的得力工具。你反他们，表明你不是一条心了，成了前进的绊脚石。井冈山兵团正是清障工，他们的使命就是要搬掉这块绊脚石。

1967年8月30日，王力和关锋由周恩来宣布“请假检查”，1968年1月，戚本禹被“抛出来”，三人都被剥夺权力<sup>3</sup>。

<sup>1</sup> 宫香政：《谎言止于真相——答俞小平》，《记忆》第256期，2019年5月31日。

<sup>2</sup> 单世联：《毛泽东71岁生日上的毛刘分歧：薄一波称寿宴鸦雀无声》，《凤凰网》，2012年2月4日。

<sup>3</sup> 王广宇、阎长贵：《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事实》，《党史博览》2005年第12期。

宫香政所说的“中央文革的少壮派”垮台了。谁把王关戚搞垮的？毛泽东啊！一个手指头点了一下，王关戚就垮了，王关戚垮台聂元梓何功之有？

无论王关戚的回忆录，还是有关他们的文革文献，都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聂元梓要打倒她自己的后台王关戚，毛泽东竟然保不住他们，这无异于是文革中的一出最离奇的神话。宫香政竟然不需要任何证据，就敢红口白牙诬陷井冈山兵团是毛泽东用来清除聂元梓、保王关戚的工具！

宫文最后说：

俞文写道：无论文革中的毛泽东，文革后的邓小平和陈云，或者是文革后复职的老干部，井冈山兵团都不是他们眼前的挡路者和事后的报复对象。毛泽东、邓、陈或者老干部们为什么要清算井冈山？——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点明了北大双方争论的实质。

如果宫香政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井冈山是毛泽东用来清除聂元梓、保王关戚的工具，而又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那么宫文中的这句话只能说是不知所云。这证实了我对我的同学宫香政的看法：今天的宫香政的论证文章，确实是既不顾事实，又不讲逻辑。👍

写于2019年7月23日

## 【评论】

### 评一份史料：《号外》

#### ——兼议文革时期北大武斗

王复兴

1968年3月29日，文革中的北京大学发生了两派学生的大武斗，简称“3.29武斗”，一周之后，4月5日“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平型关纵队”等三个战斗队发表并在北京市散发了关于该日北大武斗的《号外》。《记忆》第160期于2019年7月30日刊发了此份史料。此份史料受当年派性影响，错、谬之处极多。但该份史料却也鲜明地反映了当年北大学生的思想状态，以及发生荒诞之极的派性武斗的原因。下面，笔者对其进行点评，并对当年北大的派斗、武斗，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 一、关于该材料的可靠性

该《号外》的主题是揭发、控诉对立派的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挑起了北大“3.29”大规模武斗，说他们“一手制造了反革命流血惨案。”该《号外》的结尾部分，为了证明所述对立派挑起武斗罪行的真实可信，附录了几份“校文革”、“公社”重成员的“揭发材料”。但经核实，却恰恰证明了这些材料是杜撰和伪造的。例如：材料之二，揭发人署名是“公社红七团勤务员”的“杜xx”。为此笔者询问了四位当年“红七团”的校友，包括当年曾在中文系“红七团”担任过“勤务员”、战斗团团长的索世晖同学。四位校友共同回忆、证实：当年中文系又叫07系，在“新北大公社”的全系组织确实叫“红七团”。但该团几任勤务员从来没有一位姓杜的，1968年武斗期间的勤务员姓夏。“揭发材料”之三，该揭发人署名：“新北大公社总部负责人郑X”。1967年7月28日“新北大公社总部”重组，笔者当年做为“公社66串连会”负责人参与了总部重组工作，笔者清楚地记得，总部成员没有姓郑的。后来公社总部增加了几名成员，也没有姓郑的。“揭发材料”之四，“东语系文革主任于xx”的证词也是伪造的，东语系文革负责人有陈影、徐昌华，从来没有姓于的文革主任。起码三份“揭发材料”的“揭发人”都不存在，那么这些“材料”是谁写的？怎么写出来的？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其真假。

以上三例说明《号外》的真实、可靠性有严重问题。这在当年的派性泛滥、武斗升级的大环境之下，双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抹黑对方，甚至造谣，可谓十分平常、司空见惯。无论是“井冈山”还是“公社”都有这种毛病。因此对当年的派性小报、传单、号外这类流传至今的“史料”，当作为“史料”进行探索和研究时，应小心谨慎地辨别真伪，多方考证，“去伪存真”，切不可伪当真！

《号外》在描述“3.29”武斗的过程中，严重失实，特别表现于刻意回避了“井冈山”于28日晚至29日清晨，攻占40楼和32楼的实事，特别是首先动手占领了40楼这个重要史实。

“公社”总部成员、武斗指挥之一宫香政同学在《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一文中（刊于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一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8年3月版，125页至143页）指出：“3月28日晚饭后，公社总部接到报告：井冈山兵团在40楼动用武斗工具驱赶公社的同学（后来证实井冈山兵团抓走公社三

十名赤手空拳的男同学，包括红十团团团长)。于是，公社头头在总部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为了打乱井冈山的计划，我们不与他们去争夺40楼，我们必须占据31楼，才能稳住阵脚。”随后，“公社”用武力错误地驱赶了在31楼居住的“井冈山”同学，这确是事实。但关于谁先动手的问题，宫香政所述真确，此事已得到其他40楼攻防战亲历者佐证。40楼当时是东、俄、西语三个系男生的宿舍楼，两派学生混住。在王复兴主编的《回顾暴风雨年代（第二集）》中，北大东语系校友王明美在他的回忆文章《难忘的胜利团情谊》一文中指出：

大概在前一天（3月28日）夜晚九点多钟，住在留学生楼的我们被召回到40楼（东、西、俄三个外语系的男生宿舍）集中，说是要防备对立派井冈山兵团可能发动的武斗……当时，我们被困在二楼以上……被困在40楼的我等“红九团”战士，扼守在楼内苦等援军到来，用掐秒数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援军没能盼到，却等来了对立派的猛攻。后来得知，井冈山兵团将40楼列为主攻目标，调集了手中大部‘武装力量’围攻‘红九团’。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势之下，40楼终于楼门失守，几十个‘红九团’战士光荣而不幸地成了对方的俘虏。”王明美说，他当时也成了“俘虏”，被“井冈山”关押在28楼某层。他趴在水泥地上因为动了动身体，而被看守他们的“井冈山”武斗队员用铁棍打破了后脑勺，血流不止，以至于对方不得不于天亮之后，送他到积水潭医院包扎、救治。在医院时，他被本派同学抢回了学校。

3月28日夜至3月29日凌晨，确实是“井冈山”首先动手挑起武斗，首先攻占了40楼（后来又放弃了40楼）。但笔者并不认为凭上述史料，就可断定北大武斗是“井冈山”挑起的。因为早在3月29日之前四、五个月，从1967年年底至1968年头三个月，两派小规模冲突、摩擦、武斗就频繁地发生，对立情绪日益严重，冲突不断升级。终于“水到渠成”，于“3.29”爆发了大规模武斗。武斗是双方共同挑起的。争论武斗是哪派挑起的毫无意义，这绝不是对文革灾难的正确反思。当年两派武斗队，人性丢失，敌我不分，同胞相拼，骨肉相残。大方向皆错！争论那派武斗有理，有何意义呢？非要把错误推给别人，千方百计要证明自己投身武斗是正当的、正义的，只能说明这些人仍没走出文革的阴影，也说明文革对人性的歪曲、毒害太重太深！去问问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北大学弟、学妹们，他们能认可当年两派武斗这种荒谬绝伦之行径的任何合理性吗？

个别校友的思维还停留在五十多年前呀！

3月29日，“公社”一派确实占领了31楼，《号外》对此指控属实。但随后“井冈山”占领了中文系两派学生混住们32楼，《号外》却又回避了。被从31楼赶走的“井冈山”同学，为了报复，也为有个新的宿舍，在总部的指挥下，于29日清晨占领了32楼，赶走了32楼“公社”派的同学。如此这样怨怨相报。原“井冈山”校友樊能廷在《燕园风云录（三）》第6、7页证实，他自己于3.29深夜被“公社”人员从31楼赶走之后，根据“根据井冈山总部的安排意见”，原31楼“井冈山”战士“一窝蜂进了32斋的楼房”，“整理房间，以便安身。”他们赶走了“公社”同学，占据了32楼。原住32楼的中文系“公社”同学索世晖向笔者证实，他便是于29日清晨被“井冈山”赶出了32楼的。

“3.29”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暴力袭击事件。29日天亮以后，聂元梓陪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视察武斗现场，以便制止武斗。当他们走到32楼前面时，有人从聂的侧后方，用铁器击刺聂的头部，聂的头、脸部被刺伤，血染衬衫，她跌倒时被李司令扶住。同时，李司令的头部也被打了一个大包。后来卫戍区宣布要追查凶手，但校文革没有认真追查，此事不了了之。《号外》也承认有聂遇刺一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聂在“一片混乱”中，“她脸被打破了皮，受了轻伤。”

以3月29日的真实过程与《号外》对照，可看出《号外》对这一天的武斗的描述是严重失真的。《号外》的特点是，凡对本派不利的事一律不提或少提，凡对本派有利的事，则大肆渲染、极力夸张。这正是当年派性膨胀的一种恶劣学风。

## 二、关于3.25武斗风暴之悬案

对《号外》这类可信度较差的派性作品，要在其中查寻有用、可信的史料，须认真地花些功夫进行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作。例如《号外》在第二页第3、4二段，提到了3月25日。仔细一看，它提到了3月25日下午“公社几十名暴徒又无理毒打并扣押了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到我校刷‘打倒杨、余、付反党集团’大标语的两名战士。”《号外》透露的这条信息便有其价值。这2名地院学生有没有被打一事已很难考证。重要的信息是，地院东方红的“战士”于3月25日又闯到北大挑衅。然而当年地院东方红的头头之一聂树人在他写的回忆录《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中于第12章说，聂元梓在《回忆录》所说1968年3月25日下午七院校地派学生到北大搞武斗一

事，是聂“编造”的“假话”，断然否认有此行动。然而《号外》提供的这条信息，便反驳了聂树人的失忆。

1968年3月25日下午，在北大3.29大武斗前4天，到底有没有上万名地派武斗人号手持铁棍、木棍闯入北大，造成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之势？3月25日与3月29日两天所发生之事，有何内在联系？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指控“3.25”之事有很深的背景，在中央上层有人搞阴谋，挑动群众斗群众，企图在北大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后，把罪责推到聂头上，一举拔掉“聂元梓这个钉子”。

聂元梓的指控是否存在？先看看3.25到底有没有发生七院校闯北大要武斗之事。“3.25”到底发生了什么？此事笔者在《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一书中，于218页至220页对“3.25”发生的事，已有详细描述，并列举了三项史料来源作为证据。引述如下：

3月25日下午，地院“东方红”等七个高等院校“地派”的学生近万人，人人手持铁棍，从北大各校门湧进校园，与北大“井冈山”武斗队汇合，要挑起大规模武斗。“新北大公社师生”见状，纷纷加筑工事，准备一战。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她得到情报，即将在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后台是支持“地派”的谢富治。目的是一旦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出现人员伤亡，就可以把罪名扣到聂元梓头上，从而拔掉聂元梓这颗“钉子”。聂元梓得知紧急状态后，立即赶往市革委会面见谢富治，强烈要求谢富治到北大制止武斗发生，否则有事谢须负责。谢只好随聂在傍晚赶到北大，谢富治到北大广播台，在大喇叭里讲：“外校学生都离开北大，回自己学校去。北大师生在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领导下闹革命。”聂说谢富治讲完话以后“外校学生呼拉一下子全走了。”（《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十三章7、8节）

孙月才公开发表的《文革十年日记》（出版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存有孙月才日记的影印件。）该日记第298页也记载了3.25所发生之事。1968年3月25日星期一这一天记载了：“下午形势紧张，井冈山联合外校、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准备对我新北大公社搞大规模打、砸、抢。新人大、农大东方红进校了，并打伤了我们不少人。新北大公社为了自卫，大运石头，筑工事，空气紧张异常。晚7点左右，谢副总理、吴德同志、丁国钰同志亲临北大广播台作重要广播讲话。谢副总理指出：一、希望

北大的两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领导下联合起来。二、‘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三、外地、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是错误的。”孙月才是“新北大公社”负责人，他当年当天所记的日记，可信性不容置疑。

关于3月25日所发生之事，《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在1968年3月25日这一日期的条目下，有以下三段记载：

3月25日：“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行反聂、孙游行，并发生武斗。

同日，地院、农大、北邮等院校红卫兵开广播车到北大校内宣传，声援北大“井冈山兵团”。

晚，谢富治、吴德、丁国钰赶到北大讲话，制止武斗，要求“所有外校外地学生一律退出北京大学。”说：“到北大来武斗是错误的。”

以上《纪事》对3月25日的三段记载，与孙月才的《日记》及《聂元梓回忆录》的回忆基本一致。聂元梓曾在文革后的法庭审讯时，指控这是有高层人士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一场由校外到北大校内的大规模武斗。幸而在聂元梓强烈要求下，谢富治及时赶到北大化解了危机。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谈到在法庭预审时，她详细申辩了不是她挑起武斗，而是在1968年3月25日谢富治策动地派万人到北大支持北大“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而她逼迫谢富治到北大制止了大武斗。为此，预审进行不下去，进行调查。而后一位姓陈的预审员告诉聂：“在制止武斗的问题上，你是立了一功的，你给党中央写一个关于制止武斗的情况报告吧。”这样，聂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陈预审员。（《聂元梓回忆录》第十六章第4节347、348页）。

以上列举了三项史料证据：《聂元梓回忆录》有关章节；孙月才《文革十年日记》1968年3月25日的日记；《北京大学纪事》1968年3月25日条目。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北京大学纪事》所记录谢富治于3.25晚在北大广播台的讲话。铁的证据证明，3月25日确有地院东方红等大批武斗人员涌入北大，支援北大“井冈山”武斗，企图挑起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但未实现。

2018年9月于北京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我碰上一位“3.25”目击证人。中文

系校友索世晖告诉笔者：“3月25日那天，在学校南门大门内，我亲眼看见地院等学校汽车开进北大，车上坐着一排排手拿木棍、铁棍的武斗人员……”

3月25日那天七个大专院校成千上万地派学生涌入北大，手持兇器，准备大武斗。如果无人策划、组织并统一指挥，是绝不可能的。那么聂元梓所指控的上层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内幕是什么？聂在回忆录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聂在她的第二本回忆录《我在文革漩涡中》第十二章第4节252页中说：

经济系有个学生叫刘新民，她的父亲刘福，是北京市卫戍区的副司令员。一天夜晚谢富治在卫戍区召集市有关领导人的会议，刘福也参加了。开会途中休息时刘福出来，对他女儿刘新民讲，今天夜晚开会，是谢副总理召集的，要搞你们北大啦，从今天开始，不允许你回学校。刘福是怕第二天学校出事情，怕他的女儿赶上，发生什么危险。刘新民对她爸爸说，好，我不再回学校去了。等刘福夜里开完会，睡觉的时候，刘新民一早起来，赶回学校，急忙对经济系的老师王茂湘讲了这件事情，说上边要搞北大了，王茂湘把消息告诉了我。我叮嘱王茂湘，此事不要对任何人讲。

以上这件事，发生于“3.25”之前一、二天，因此聂元梓心里有准备，于25日那天逼着谢富治去北大表态，制止武斗。并对谢说，“你必须跟我一块去制止武斗，否则你要对武斗负责！”如此一“将军”，谢才不得不去北大，从而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流血。

对此事的内幕，聂元梓有她的分析、判断。她在上述著作第259页指出：

文革初期，北大一张大字报被利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据点，现在，北大早已不跟着他们了，成了反中央文革的据点。他们要把我除掉，然后派别的人来北大，这样就能领着学生跟他们走，照他们的指示办了。后来林彪垮台了，迟群、谢静宜整我的时候，我也不能讲，那时候谢富治还没有倒，江青还在台上，而且8341是毛泽东派的啊。

这前前后后足以证明，正是谢富治和上级领导搞的阴谋，挑动武斗嘛！但后来往监狱抓我的时候，在北大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却宣布说是我搞武斗，我是武斗的后台。我搞武斗，还能把外校的上万学生召到北大打我们自己？我为什么不叫北大学生到别的学校去砸他们的广播台？不到他们的学校搞武斗？

聂接着指出：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2013年第3版第39页）写到：“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武斗的积极态度。”

吴德这段话还是没有把实话完全讲出来，既然你“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布置的”，为什么不把你“知道一定”的根据讲出来。不过这段话也已经说明了问题。大家都知道那时中央文革的人有谁？王力、关锋、戚本禹、周景芳早已经打倒了，难道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还能下到各群众组织中去活动、作指示吗？很明显，就是通过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那一帮人，所以吴德不敢讲，就是也怕牵连到自己。

笔者赞同聂元梓以上的看法。1967年8月王、关倒了，68年1月戚本禹倒了，毛泽东抛出王关戚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但此举江青不会高兴，最高领袖也不会高兴。聂、孙、新北大公社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炮轰谢富治是被中央文革派记了一笔账的，3.25就是他们企图拔掉北大这个钉子的一次部署。据北京市卫戍区副司令刘福对他女儿刘新民透露的情报，此事件的策划者起码有谢富治。还有什么更高层的策划者？还有什么更深更黑的内幕？这就有待于将来刘福说的那个会议的档案解密才能揭开秘底。此外，还有待于另一个重要档案解密，即文革后1982、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起诉，而后来却取消了对聂元梓策划、指挥武斗罪的相关档案资料。

历史的真相必须用证据证明。在有关档案解密之前，3.25武斗的内幕与真相，仍是一个悬案。

### 三、关于“二月逆流派”

《号外》认为北大武斗的政治背景是所谓两派对“二月逆流”的分歧，这确实道出了一些实情。《号外》在结尾倒数第二段指出：

聂孙之流所精心策划的这场大规模屠杀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的。长期以来，小爬虫聂元梓在杨、余、付反党集团的操纵下，疯

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二月逆流翻案，颠覆以谢付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犯下了滔天罪行。……目前，我兵团战士响应最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揭发杨余付反党集团及其乏走狗聂元梓的滔天罪行。

请看，《号外》揭批聂元梓要“为二月逆流翻案”，并认为这是两派斗争的“深刻背景”。当年“井冈山”把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打成了“二月逆流派”，要与之“血战到底”。

《号外》在结尾最后一段说，“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痛击为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翻案的黑风，打退杨、余、付反党集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的猖狂进攻，揪出他们更大的黑后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二月逆流”指的是什么？是指：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议上，三位副总理、四位元帅即“三老四帅”（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与被毛泽东所支持的中央文革派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周恩来主持了这两次会议。此事，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后被中共称为“文革”初期一次党内高层对文革的公开抗争，即“二月抗争”。斗争的实质是中共的老干部派集体希望抵制文革对他们权力、利益甚至是人身安全的侵害。反对“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

毛泽东听取了这两次怀仁堂会议的汇报之后，表态支持中央文革，痛斥了“三老四帅”。2月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毛责令谭、陈、徐停职检查。此后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召开了七次会议，对“三老四帅”进行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把“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的罪名定为“二月逆流”。

毛泽东曾指示“这件事只限制在中央内部小范围进行批判。”但“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康王、王、关、戚却违背毛的指示，通过《红旗》杂志林杰至北师大谭厚兰和学部吴传启这条线，在北京至全国，掀起“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的风潮。1967年3月7日，首先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的“北京公社”、钢铁学院的“919”、民族学院“东方红”等单位，同日发表声明并在校、

本单位贴出大标语，提出：“打倒谭震林！”、“揪出谭震林的后台！”“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但这些单位没有一个是农口的。（谭震林当时主管农业。）

在红代会讨论当时的形势时，谭厚兰对他们掀起“打倒谭震林”浪潮的背景，守口如瓶，什么也没有说。但大家都知道他们这样做是有后台的。在对待二月逆流流态度上，北京分为“炮轰派”和“打倒派”。

北大由开始跟风提“打倒”，后来倒退至只“炮轰”。主张对“三老四帅”一批二保，而不是打倒。于是北大成了“炮轰派”的主要代表。由于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对反击“二月逆流”的消极态度，而被北师大“井冈山”和北大“井冈山”攻击为“二月逆流派”，“为二月逆流翻案”。

以上即《号外》所指“3.29”武斗围绕“二月逆流”问题的“政治背景”。《号外》企图以此解释武斗的根源是由于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政治不正确。

《号外》反映出当年北大两派在对待“二月逆流”问题上，双方在认识方面的分歧。聂、孙、“公社”无疑在“二月逆流”问题上属于先知先觉的正义之师，并因此被“井冈山”错误地批判为“二月逆流派”、“最大的保守派”，并被认为是自己进行派斗和武斗的正当理由。当时聂、孙、“公社”在“二月逆流”问题上，斗争的矛头主要是向上，针对林杰、王、关、戚，对外主要是与学部吴传启、北师大谭厚兰有分歧和斗争。与北大“井冈山”的分歧应是认识范畴内的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的区别。笔者不同意把当年北大两派在认识上的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把“井冈山”群众视为错误路线的敌人。不可这样扩大化，以阶级斗争观来进行解释。但也不能反过来，否定当年聂元梓、孙蓬一、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反左，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斗争的正义性。这正是北大文革的一个亮点。但如果今天仍有个别校友坚持《号外》的观点，认为自己是“反二月逆流”的“英雄，而当年的聂元梓、“公社”群众都是“老保”，政治立场错误。那就太可悲并令人遗憾了。

#### 四、《号外》所反映出的极左激进思潮

从《号外》的政治立场、思维模式、激进的革命话语，可以看出当年《号外》的作者所代表的北大“井冈山”个别骨干，已完全被“阶级斗争理论”所俘虏，把对立派师生、干部当作“敌人”，恨得咬牙切齿，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号外》一开篇，就把“校文革”、“公社”师生说成是“杨、余、付反党集团的乏走狗”，把本派说成是“新

北大革命派”。并表示，“五千多名井冈山战士怒火万丈，决心紧跟毛主席，与杨余付反党集团及其黑后台血战到底。”看看这情绪，“怒火万丈”，要“血战到底”呀！

《号外》出于这样一种尖锐对立的派别立场和敌情观，把本校的师生和工人，只因分属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便打成“敌人”。《号外》把几百名工人、学生说成是“暴徒”，说“北大公社工人兵团和钢一连数百名暴徒”如何如何。又在第一页最后一段，说公社的头头黄元庄、贾传喜、丁建华等人是“大流氓大工贼”。黄元庄是后勤部的工人、丁建华是历史系二年级学生，被《号外》点名污辱为“工贼、流氓”，视为“敌人”。

当年泛滥成灾的泛阶级斗争观，把人群撕裂成不同阵营，流行仇恨思维、斗争哲学，狼性取代了人性。这种泛阶级斗争思潮成为北大打派仗时，学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号外》很鲜明地反映了当年学生的这种思想状态。

这种激进的极左思潮，从1967年3月至1968年7月，愈演愈烈。早在1968年3.29武斗前一年，1967年3月时，自从郭罗基贴出给聂元梓整风的大字报，“公社”内部以0363“北京公社”战斗队为核心，形成批评聂元梓、孙蓬一的整风派。整风派当时只是提意见，整风，是正当、正确的。校文革实行“开门整风”，聂、孙也多次作了公开检讨。当时“公社”有个别战斗队（后来称为“联战派”），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反批评批评者是“砍新北大红旗”，是“逆流”。这时聂、孙有个重大失误，没有及时阻止这种阻碍批评、压制整风的歪风。整风派不服这种攻击，于是批评校文革、聂、孙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师生间产生了对立情绪，但总体上还是斗而不破的统一局面。形势突变发生于6月5日。

1967年6月5日，陈伯达为阻止聂、孙、“新北大公社”明反吴传启、暗反王关戚的势头，发表两次讲话，蓄意挑动北大分裂，让“新北大”后院起火，牵制新北大。陈伯达6.5清晨在北大大饭厅对学生和聂元梓说，“北大是一潭死水……没有波浪有什么意思？”“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晚深夜陈伯达在人大大会堂又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针对聂元梓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作内战口实，一定要垮台。”斥责聂、孙，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引自《记忆》第143期）陈伯达的这个6.5讲话，严重混淆敌我关系，挑动北大分裂，挑动内斗，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井、红、团、零、飘”公开分裂，成为北大打派仗及尔后武斗的源头。陈伯达“6.5讲话”是北大内战、武斗的根源。反对派于“6.5”之后，对权力机构校文革，放弃了整风方针，由整风变

为“打倒”、“砸烂”、“革命”。从而形成：真理向前迈一步，变成了谬误。最终由内斗发展为武斗。

1967年8月17日，北大反对派“井冈山”正式成立，其纲领就是在北大实践“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路线。正如其成立宣言中说：“我们革命造反派，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坏工作组的反，大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今天我们又大造聂元梓、孙蓬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去完成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历史任务。”当时“井冈山”在校园四处张贴大标语：“二次革命！”“全面夺权！”请注意，这就是当年“井冈山”骨干力量的激进革命思潮。他们要反，反，反，一反到底，不停顿地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左得很！他们在实践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理论，绝“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要将它“彻底摧毁”。他们满怀着激进的革命情感，这里那有什么个别校友反思所说，自己当年是争自由，反暴政？这样离谱的反思，也太脱离历史的实际了吧？你那时就有“普世价值”观？没有受“阶级斗争”、“继续革命”论影响？可笑！

当年北大两派都把派斗视为阶级斗争，并把斗争焦点视为政权。“井冈山”要夺权，“校文革”、“公社”要“捍卫红色政权”。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由文斗发展到武斗。斗争的焦点是权力。其中崔雄崑的遭遇很有典型意义。《号外》在第二页称崔雄崑是“三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给崔雄崑扣这么大的帽子不是偶然的。崔在文革前是校党委常委、教务主任。校文革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聂、孙首先结合了曾反对过陆平的老干部崔雄崑。1967年11月30日，聂元梓在党员大会上宣布北大恢复校一级党的领导小组，由谢富治、吴德审批了新北大领导小组名单，其中：组长聂元梓；副组长孙蓬一、崔雄崑。这显然是聂、孙为巩固权力采取的重要一步。新的北京大学中共领导小组名单是清一色的一派人马，没有一名“井冈山”成员，是个“派性整党”。“井冈山”马上反制。一个月后，12月30日“井冈山”把崔从家中抓走，绑架。1968年1月6日，“井冈山”小报《新北大报》发表《坚决打倒崔雄崑，深挖17年黑线》的文章。自崔被绑架，两派的斗争骤然升温，小规模磨查、武斗不断，且不断升级……从两派对崔雄崑的结合与打倒，可看到北大两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共同旗帜下，围绕着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派斗，竞争谁是真正的革命派，争夺对北大的领导权，最终由文斗走上了骨肉同胞相残的武斗。这是原两派校友应共同记取的历史教训。

## 结束语

美国华人文革史专家、社会学博士乔晞华先生于2019年4月出版了《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一书（美国世界华语出版社，2019年4月）该书以社会运动学的视角，分析、总结了文革群众运动的发动、分裂、灭亡的三个阶段。其所指群众运动是指区别于党的运动，例如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等等；而以群众的诉求、抗争为主体并有广大人群参与的社会运动。主要指1966-1968文革主体阶段群众反官僚的造反派运动，包括其后阶段的内斗与被整肃；但不包括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破四旧、抄家及文革中后期工军宣队领导的“一打三反”及“斗、批、改”。

乔先生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革的“群众运动是被自己内讧打败的。”作者在全书开篇的《内省》一章指出：

轰轰烈烈的文革群众运动以失败而告终。群众运动是被自己的内讧打败的。认真地总结文革中群众运动失败的教训，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运动不无益处。被歪曲的文革群众运动史，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文革群众运动与其他中国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文革后的多次社会运动，依然继续在犯先驱们同样的错误。我们希望本书能为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提供启示和借鉴。

据说此书被查禁，与其中心论点有关，这或许更说明了这个论点所表达的历史经验之重要。笔者赞同这一论点，认为这一历史教训极其重要，它涵盖了大量信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中国民族性的缺陷，未来民主运动的运作等。从文革群众造反运动的历史进程来看，群众运动分裂，内讧、互斗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在《绪论》第XXIX页指出：

由于中共当局对造反派的丑化，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地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为中国今后的群众运动提供借鉴。文革中，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分裂。每当造反派获得一个大的胜利，他们立即分裂，陷入内战，造反派的能量在内战中消耗殆尽。……造反派没有能够联合有多种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对形势的误判。他们没有分清真正的敌友，以为保守派已经完败。在对权力贪婪的驱动下，把曾经同一战壕的战友当成了敌人，试图独霸天下。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策略，出现了造反派的分裂。如果造反派在保守派失败后能够迅速地联合，共享胜利果实，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改

写。认真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对今后的中国社会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分析了文革中12个省市包括北大、清华的群众造反运动，总结出其普遍性的规律是：文革群众运动一旦翻身成为主流，便分裂，开展派斗，直至武斗。而分裂的原因，始终围绕一个“权”字，而在争夺权力的背后，则是人们藏于内心的一个“利”字。简言之，打派仗、内斗的原因是为着争权夺利。谁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并掌大权，谁就能主牵文革后的命运并避免被对立派“秋后算账”。

1967年6月至1968年7月，北大两派的派斗、武斗，是理想之争吗？是信仰之争吗？是路线之争吗？都不是！

校园内武装割据，激烈地武斗，是什么性质的武斗？是革命夺权战争吗？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吗？是民族解放战争吗？当然不是！

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武斗，是争权夺利的内讧。有个别文革亲历者在反思文革的派斗、武斗时，总要为当年荒唐的“全面内战”包装一层美丽的外衣，为自己当年的荒谬行径寻找一个正义的理由。这只能表明这些朋友还没走出文革的迷雾。同时也说明派性这种愚昧、落后、腐朽、反人性、反文明、反社会的思想意识十分顽固，对人性具有极大的腐蚀性，对社会有极大的破坏性。派性实在是一头怪兽，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批判，进行清除。

文革中的派性，为什么会泛滥成灾？为什么极其顽固？其深层原因有五点。

一、在当年“阶级斗争”、“斗争哲学”、“仇恨思维”这种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毒害之下，对立派同学仅仅因为对形势的不同认识，而把对方视为“敌人”，展开激烈的内斗，直至武斗。

二、中国是个内陆国家，有史以来王朝轮替，都是争夺内陆地盘，占土为王。中国不是古希腊那样海洋性的城邦国家，自古以来人们缺乏对外开放、拓展的眼光。即使在明朝郑和率领强大船队下西洋，也没发展国际贸易并对外殖民。甚至到了大清，仍长期实行“禁海”政策。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治者从来是占土为王，掌控众生。社会的思想即统治阶级的思想，由此而形成了“窝里斗”的民族性格。这是中国国民性的一大弱点。

三、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文革中及文革前，中国只有微弱的商品经济。仅在农村有小型集市贸易、城市有少量的手工业者，而这些还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时不时要打击、扫荡一下。市场经济的规则是公平交易。交易双方只能都

有利可图才会成交。即所谓互利互惠才能合作共赢。因此人们便养成了协商、妥协、让步、互利的习惯。但毛时代的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小农经济的狭猛眼光占据着人们的心灵，流行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灭掉我的“窝里斗”。看看清华团派和老四关于革委会的组成之争执，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发展成了武斗。

四、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糟粕影响深远。中国广大农村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族文化、祠堂崇拜、同姓相助、老乡最亲，排斥异己。城镇的行帮、漕帮、民间宗教，都浸透着强烈的宗派性与排他性。加上科举制度中流行的同师同门，也是拉帮结伙。官场更是流行派别之争，党同伐异。这些中国人的派性基因，在文革中得到充分表演和暴露。

五、党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山头主义。既有亲莫斯科的国际派；又有土地革命的本土派，各根据地又各有山头。在红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方面军、各野战军不同派系。中共在权力分配、组织建构中，从来讲究照顾山头，这是同志间心知肚明的潜规则。人们看到：文革中党内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一个倒下，一倒一大片；一个上去，一上一大帮。党内流行谁是谁的人这种人身依附。记得文革初期我在北大看大字报，看到大字报中揭露中央党校领导林枫与战友通电话，林枫在电话里说：“刘公有没有事？刘公没事我就没事！”后来刘少奇倒了，林枫也垮了。此事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原来党内权力斗争与派别斗争竟是如此紧密相连！这种党文化在文革中也深深影响了群众运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文革中的派性，尤其在1967、1968这两年得到了充分表演和暴露，形成了全面内战、天下大乱，很多地方甚至动枪、动炮、动军舰。社会正常秩序遭到了极大破坏。群众运动因内战而丧尽人心，终于走到了终点。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造反派五大学生领袖，批评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搞武斗。”把造反派赶下了历史舞台，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和一切上层建筑领域，终止了文革群众运动。

有一种意见认为，文革群众运动灭亡的原因在于领袖的意志与决定。笔者认为毛泽东“7.28召见”固然是文革群众运动结束的决定性条件，但这毕竟不是内因。内因是造反派走到7.28时，已失去了合法性与合理性，势必“寿终正寝”。当时北大的武斗，不但海淀居民反感，北京的工人、市民和郊区农民也讨厌，甚至北大两派的大部分学生也因反感而成了逍遥派。两派坚持武斗的人员，各派仅剩下几百号人。

北大两派真正参加武斗队的人员其实很少。根据后来工军宣队进校后，两派分别上缴的武斗工具推测，按主要凶器的80%计（20%库存、备用），估计“井冈山”的武

斗人员大约有700人左右，“公社”的武斗人员大约有900人左右。据“井冈山”中文系的一位武骨干写回忆文章说，他们坚持到最后的武斗人员仅200人左右；“公社”的武斗人员也是越到后来人数越少，仅剩三四百人了。两派的逍遥派共有10000人左右，也就是说逍遥派占全校师生的86%以上。他们厌恶武斗，躲避武斗，许多人都回家了。相对而言，这绝大部分师生的态度是正确的，但他们对武斗却无可奈何，形势被两派激进的头头所控制。在清华的武斗中，当时处于广大中间地带的逍遥派，曾联合起来倡议老团、老四放下武器，停止内战、进行谈判，但没有成功。此事具有典型意义，北大也有类似事件。在派仗正酣时，历史系两派教师就曾议论，“学校上面不联合，咱们历史系教师先联合。”历史系“井”派教师领头人李源，曾到系文革委员魏杞文老师家里开会，商议联合。但形势比人强，他们左右不了局势，终归失败。两派热衷以武斗击垮对方的激进的头头们掌控了局势，他们不碰南墙不回头。到“7.28”，两派日益激进化的头头被最高领袖同时赶下历史舞台，这才终于老实了。

工军宣队进校后，两派头头谁也没落着好果子吃，在肃清516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全都被整肃……全国如此，北大、清华也如此。👍

2019年8月3日

## 【评论】

### 评《号外》<sup>1</sup>

#### ——北大武斗的背景和“井冈山”的立场

胡宗式

宫香政的两篇文章，已基本把北大武斗问题说清楚了（此处不再赘述），现只就《号外》论之。文章无视3月25日七校万人闯入北大闹事的事件，也无视3月29日刺伤聂元梓、打伤李钟奇的事实，采取哀兵必胜的方式，只讲自己人如何挨打（对这些挨打的例子，现在已无法一一核实）。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同时询问了相关人员），我认为：

1. 这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才有的强拉硬扯、胡搅蛮缠的作品。
2. 从市革委会批判聂元梓到“杨余傅事件”，再到3.27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在

<sup>1</sup> 《号外》是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平型关纵队、中南海纵队、挥斥方遒（1968年4月5日）印发的传单，其文章的标题是《聂元梓血腥屠杀新北大革命派，北大公社内部的揭发》，详见《记忆》第260期。

外校不断到北大来寻衅、武斗一触即发的政治大背景下，是不可能有所谓的关于策划武斗的“临湖轩会议”的。临湖轩是校文革领导经常开会的地方，28日若真有会，应当是传达有关杨余傅事件一些信息的小范围会议，不可能是武斗的会。有人口口声声说有“临湖轩会议”，但又承认宫香政没有与会，说宫格的资格不够。笔者认为，如果是有关武斗的会议，不可能不让宫参加。实际上“临湖轩会议”说的是杨、余、傅的事情。关于杨、余、傅事件，第一次大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是军队内部的会议，说是3.24晚上开的，实际上会议开始时间很晚，会议结束，已是3.25凌晨。会议内容通过某种渠道传到北大领导那里，还要晚两天，校文革领导层小范围传播这些信息，显然不会通知宫参加，所以宫对“临湖轩会议”一无所知。

3. 《号外》说：我新北大井冈山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站在最前线奋起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风，保卫了“以谢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

《号外》自己坦白了北大武斗的政治背景和“井冈山”的政治立场。这是一场严重的、持续了一年多的斗争。

(1) 自1967年3月起，在所谓“二月逆流”问题上的“炮轰派”与“打倒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其实质是“炮轰派”对王、关、戚、中央文革，乃至毛本人的极左路线的抵制。这种抵制受到了“打倒派”、中央文革乃至毛本人的严重打压。相反，“打倒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乃至出现以打倒周恩来为目标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却是中央文革乐于见到的。

(2) 新北大公社向吴传启一伙宣战，矛头直指王、关、戚和谢富治，挖了毛的墙脚，为毛所不容。北大反对派（“井冈山”的前身），完全和王、关、戚、吴传启一伙站到了一起，北大内部斗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反对派从对聂元梓有意见，已经转化为保王、关、戚及其同伙了。反对派希望借此打垮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由他们来掌权。

(3) 陈伯达6.5讲话极力打压北大反吴传启的活动，北大反对派成了王、关、戚、吴传启一伙搞乱北大的工具。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做好了垮台的思想准备。如果王、关、戚不垮台，新北大公社必垮无疑。

(4) 毛在压力下被迫先抛出关锋、王力做替罪羊，但毛关于王、关、戚的指示并未公布，关、王虽下台，但其罪行并未受到揭发批判，戚还在台上，新北大公社稍获喘息，但压力依旧。北大“井冈山”并不认为保王、关、戚有错，仍做着夺权的美梦。毛抛出王、关、戚，心中是非常不情愿的，所以他从未肯定过新北大公社反对王、关、戚

的努力。这也是北大“井冈山”能够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5) 谢富治及北京卫戍区举办“高校学习班”，企图以“反派性”压制反对王、关、戚并为“二月逆流”打抱不平的群众组织，这一做法遭到抵制。一些群众组织把矛头指向了谢富治。

(6) 戚本禹及周景芳被抓，谢富治不得不把市革委会中周景芳安插的人马清除出去，其数量令人吃惊，谢富治假惺惺表示要“整风”，聂元梓信以为真，提了意见，结果受到严厉批判，这是3.25七校万人冲击北大的原因之一。

(7) 抛出王、关、戚，使中央文革颜面大损，毛本人也面上无光。“二月逆流”们会很高兴，这是毛不可接受的。抛出王、关、戚是毛被迫无奈之举，心里非常不情愿，于是迁怒于1967年8月为周恩来传递信息、施加压力的杨成武。所谓杨、余、傅事件，主要是杨成武，事件的内幕至今仍是一个谜，但毛要借此对抓住王、关、戚问题不放的群众组织进行打压，是可以肯定的。

(8) 在宣布杨、余、傅问题的同时，掀起大规模的反击浪潮，即“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风”，以及“保卫以谢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完全是为了打击对王、关、戚、谢富治不满的党内外正义力量，维护毛自己的路线。实际上，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发声，只有“炮轰派”如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指责对立派“北京公社”反对周恩来（3月11日），但中央文革对此不能容忍，当场厉声呵斥。毛泽东也不能容忍，他非常担心“二月逆流”借此翻案，导致文革崩盘，所以一定要严加打击。

3月2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总部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再次严正声明》。声明写道：坚决揪出在其黑后台操纵下，为“二月逆流”翻案、炮打谢副总理、颠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小丑聂元梓！聂元梓必须交待与杨成武之流的黑关系。

校内外的反聂元梓，反新北大公社的力量认为时机已到，要用外力搞垮北大。

七校万人冲击北大，就是一个极端施压的标本。关于杨、余、傅事件的大会从3月24日夜开至3月25日凌晨，刚过几个小时，七校万人就向北大进发了。显然，这是有人在幕后统一策划部署的。策划者的层次，应该相当高；策划应该在此前；行动的时间，就定在这次大会之后；行动的方式，是突然袭击；行动的目的，是挑起大规模武斗，然后栽赃给聂元梓。这一事件，应该很容易调查清楚，实际上也已调查清楚。审问聂元梓的预审人员听了聂的陈述后，不再追问武斗之事，就是明证。此事件显然涉及上层，

故当局不敢公布真相。但后人研究北大文革史者，不可忽视这一事件及其影响。

(9) 新北大公社自1967年3月以后，一直处在高压之下，“二月逆流派”、“分裂中央文革”、“支持全国的保守派”，种种罪名，不一而足。任何一个院校的任何一个人的广播车，都可以开进北大校园挑衅。极端的施压必然引发强力反弹。新北大公社的许多人忍无可忍，他们愤怒了，于是拿起了长矛。新北大公社拿起了长矛之后，再没有哪个学校的人敢闯入北大校园寻衅了。1967年4月11日六校广播车闯入北大寻衅，以及1968年3月25日七校万人闯入北大寻衅的事件，再未重演。

4. 关于武斗问题，我相信在清查516时宣传队早已弄清楚了。8341为了搞垮、搞臭聂元梓，一定会在武斗、打死人方面大做文章。对聂元梓没有过硬的材料，只好拿歪曲、捏造汉中炸楼事件在全校大会上做文章。1982年的审判，邓小平、彭真会放过武斗问题吗？但没有证据，只好作罢（判决书中没有武斗问题）！

5. 1968年3月22日公社组织的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人都是公社的，没有校文革的人参加，指挥体系是公社的。聂元梓如果召开策划武斗的会，为什么没有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人参加？高云鹏（哲学系文革主任，4月份任武卫负责人）、丁建华（公社总部委员负责宣传，不是武卫指挥部成员、北大革委会委员）、宫香政（公社总部委员，武卫负责人之一）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会议，更谈不到参加这样的会议了。

郑雄原是1966年北京公社的创建人之一，新北大公社成立时曾任公社总部委员，1967.6.5以后，公社总部改组，他回到系里，不再是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了。

所谓“东语系文革主任于××”，我们询问了李清昆老师，他说：“东语系文革主任是徐昌华，是一个教研室主任，人很老实，我与他很熟。前些年还常有联系，他患严重的帕金森症，近年无联系了。没有于××这个人。”陆水林是东语系的，证实了李老师的说法。徐昌华是日语教研室主任。

6. 宫香政告知：井冈山兵团五一纵队是工人组织，是公社的工人兵团的对立面，40楼是学生宿舍，五一纵队怎么能住在40楼呢？这只能说明五一纵队配合九纵、十纵在3.28晚上首先占领了40楼，并抓走了公社一方30名战士，包括红十团团团长。44楼里面没有工事，更没有砖头、匕首等凶器，一楼门口有站岗的，配有一定的防卫力量（但公社方面从来没有炸药）。

7. 44楼北靠员工食堂、校医院，南靠学生宿舍区，东面是学生食堂、澡堂，西面是留用地、围墙。44楼原是招待所，没有学生居住，不存在清理井冈山人的问题。我

们动态组在一楼一进门的房间，我住在这里。公社的办公机构在此，对外联系也在此，武斗以后依然如故。武斗开始后，钢一连进驻44楼（二楼）。大约是1968年6月的一天，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的领导来访，因为总部委员正在开会，总部委托我接待了他们。

8. 关于信号弹问题：《新北大》68.3.30增刊有报导：“晚十二点半，在16楼的房上打出了7发白色信号弹。”据赵建文生前讲过，校文革简报组对此也上报过。康生对上报的简报给予批评：“玩什么把戏！”。

9. 《号外》说：晚上十点半左右，校文革常委、各系文革主任和北大公社总部头头又在临湖轩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由聂元梓亲自主持审查修改了“3·29”反革命大屠杀的罪恶计划。由于会议讨论时间太长，超过了原计划动手的时间，故将此次行动，推迟到二十九日凌晨〇时三十分。“还说：“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多钟公社社员纷纷退出了非重要阵地，卷起了行李，从三十二、三十四楼集中到四十四楼、二体等地。这天晚上公社十团的暴徒们，一直未睡觉，不时在楼道内走动，等待信号，十点多钟公社三团、九团把早已准备好的木床放到四十楼二楼的楼梯口，以便堵住三四层楼上我兵团“五一纵队”战士，在三十楼的公社女老保又忙着用木床堵二楼楼口，准备在内部接应公社占领三十楼。——都行动起来了，临湖轩的会议还没有开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0. 《号外》写道：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大流氓、大工贼黄元庄又在北大公社总部四十四楼229室，召开各战斗团团长秘密会议，会上，认为四十四楼太偏僻，控制不了学校中心区，再一次研究决定首先攻占三十一楼，然后占四十楼、二十九楼，直通井冈山总部二十八楼的罪恶计划。会上决定，当晚十一点半钟由公社一团三团动手抢占三十一楼，公社九团和钢一连部分暴徒分别在四十楼和三十九楼袭击我井冈山五一纵队和十六纵队，以牵制住这两个纵队，使之不能去援救三十一楼被围挨打的井冈山战士。俄文楼武斗学习班，工人兵团和钢一连其他打手分别在三十一楼刺杀井冈山战士，同时抓捕毒打从三十一楼内跑出的井冈山战士。然后拿下三十楼和二十九楼，一举攻下井冈山兵团总部所在地二十八楼，把井冈山赶出学校。——黄元庄不是总指挥，他怎能布置这些？黄元庄怎么会在上午预知五一纵队晚上在四十楼？

另外，俄文楼是红代会的办公地，许多外校人员住在这里。把这里作为武斗班子的据点，有违常识。 

【人物】

## 士可杀不可辱

### ——心理学教授沈迺璋之死

舒声

沈迺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心理学的老前辈。据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 年 11 月 3 日介绍：

沈迺璋（1911-1966），浙江吴兴人（今湖州），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心理系，



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心理系。在孙国华教授指导下，沈迺璋罕见地以《白鼠视辨大小之差阈及视型明度对于视辨反应之影响》与《左右手同时举重试验》两项研究于 1936 年获硕士学位。同年，由于天赋出众且成绩优异，沈迺璋由清华大学出资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进修。1938 年秋回国后，历任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讲师、教授，1945 年起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主任。1950 年入选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委员。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沈迺璋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任教授，并兼任心理学教研室主任，直至 1966 年 10 月 6 日去世。

1938 年秋回国后，沈迺璋先是拒绝为日本人服务而赋闲在家，在几个月后他担任了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讲师，才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1959 年，中国心理学界就心理的研究对象、任务、性质、方法等问题举行了一场为期 5 天、规模庞大的研讨会，200 多位国内心理学精英与骨干悉数赴会。会议气氛空前高涨，与会者在关于心理学的对象和任务的问题上产生了显著的分歧。一些学者独断地认为所有心理现象都具有阶级性。而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曹日昌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反应过程，并不随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沈迺璋旗帜鲜明地支持曹日昌的观点，并进一步强调按照心理学学科分支的侧重，普通心理学就应该专门研究心理过程，不必研究个性。半个多世纪后，北京大学心理系任仁眉教授在回忆亲身经历的批判心理学运动时痛心地疾呼：“希望每个人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要真正地想明白再说再做，如有压力，就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做；不要人云亦云，言不由衷，跟风随大流。研究科学的人说话是要有根据的，不能胡说八道。”或许，读到这里我们才能深切地体会到沈先生这番切中肯綮的发言是多么宝贵。

翻开中国科学院 1949—1950 年全国科学专家调查综合报告，沈迺璋的名字赫然出

现在心理学组的第19位（共67人），这般傲人的学术成就足以连同他的名字一起被载入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史册。

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官网上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组建了中国科学院。1950年，在郭沫若院长和丁瓚先生的支持下筹建心理研究所，成立了心理研究所筹备处。筹备处主任：陆志韦；副主任：丁瓚、曹日昌、陈立；委员：潘菽、唐钺、孙国华、周先庚、臧玉淦、卢于道、沈迺璋、林传鼎。8月，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筹备委员会，挂靠在心理所筹备处。从这个名单上也可见沈迺璋学术地位之高。

《大众心理学》杂志2015年第一期上刊登的杨俐娜、陈巍“一生傲岸苦不谐，未尝一日低颜色——记中国现代实验心理学家沈迺璋”一文中全面介绍了沈迺璋先生的生平 and 学术业绩后写到：沈迺璋的人生际遇如同燕京大学一样令人扼腕，也昭示了近现代中国心理学事业发展的命运。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沈迺璋被软禁在燕京大学近三个月，让其交代“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文革期间，沈迺璋更是遭受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以高贵的头颅与铮铮傲骨反抗那些荒唐的人身攻击，直至10月16日（应为10月6日）在家服毒自杀，年仅55岁。

关于沈迺璋先生死亡的情况，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一书中记载：1966年10月6日，凌晨，哲学系三级教授沈迺璋在家服毒身亡，时年55岁。生前，沈曾经被批斗、抄家、打骂、侮辱。据一位北大哲学系校友回忆：

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迺璋自杀前，哲学系心理专业六二级10多个学生在团支书（女）带领下抄了他在朗润园的家。一行人闯进门后翻箱倒柜，大声斥骂这位文质彬彬的教授，他低着头一声不响。这帮人把他本是优雅干净整齐的家弄得一片狼藉，在准备撤离时，一男生把事先准备好的写有“反动学术权威沈迺璋”的大纸牌子挂在他的脖子上，再将一把扫帚塞进他手里，喝令他每天上午带着牌子拿着扫帚从他家中穿越整个校园到38斋男生宿舍打扫卫生。后来就听说他自杀了。

1966年10月，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他们比工作组时期对待广大干部和教师的态度更加恶劣，对所谓“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更加凶狠，建立了劳改营（牛棚），并放任一些思想极左的学生对部分干部和教师进行抄家、批斗和侮辱。在沈迺璋之前，已有西语系副系主任、副教授吴兴华在劳改中被迫喝污水导致中毒身亡，英语二级教授俞大綱（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的夫人）遭批斗、抄家，服毒自杀，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遭到残酷批斗，服毒自杀。哲学系是校文革主任聂元梓的

大本营，也有一些思想极左、紧跟聂元梓的学生的行为十分恶劣，对自己的老师抄家，批斗，勒令劳改，甚至打骂。

有人或许会问：沈迺璋是一位心理学家，按理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应该会比较强的。但他为什么没有忍辱偷生，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呢？

这里就要提到一句成语“士可杀不可辱”。这句成语出自《礼记·儒行》：“儒有可亲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文革中一些知识分子在受到侮辱后，选择了自杀的道路，正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儒或士的这种精神，宁折不弯，宁死不屈。对此，我们绝不可误解他们，而应同情他们，尊敬他们，同时更加痛恨那些迫害他们、导致他们含冤而死的恶人。

遗憾的是，文革结束40多年了，在北大，那些文革中冤死的干部、教师、学生虽然已经得到平反昭雪，但那些制造冤案、惨案，迫害他人，批斗抄家、侮辱他人，导致沈迺璋等老师死亡的人，却没有一个肯于站出来说一句道歉和忏悔的话，而有些人还在为文革的代表人物、北大文革的罪魁祸首鸣冤叫屈，甚至唱赞歌。这能说文革已经被彻底否定了吗？能说文革的流毒已经肃清了吗？这些现象难道不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吗？

刚刚过去的10月6日是沈迺璋先生去世53周年的日子，让我们沉痛悼念沈迺璋先生，愿他的灵魂得到安宁。

写于2019年10月11日夜

【人物】

## 北大文革“老佛爷”聂元梓（节选一）

樊能廷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北大文革期间，“老佛爷”这个词儿，专指聂元梓，这还是不分少长、不分派别，都这么称呼她。北航韩爱晶记述的《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中，我数了数，毛泽东九次说到“老佛爷”这个词儿，还有一次说“佛爷”。这个“召见会”上江青也三次说“老佛爷”这个词儿。就我所知，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尊为“老佛爷”的枭雄人物，聂元梓是“绝无仅有”。

“老佛爷”这个词儿的流行，来源于电影《清宫秘史》的全国播映——晚清慈禧太后被尊为“老佛爷”，懿旨纶音一出，后脑勺拖小辫子的“月亮头”们，都“喳、喳”应承。北大呐，文革起始的两年，聂元梓定于一尊，其他人都只能“喳、喳”。

这样，我就把“老佛爷”这个词儿，交代清楚了。

我要讲的内容是“老佛爷”聂元梓的文革“行状”。解释一下“行状”这两个字——行动的“行”，状态的“状”。“行状”又称为“行述”，就是叙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平行事的文章。现在一般人的，叫作《某某同志生平简介》，大多随讣闻分送，或者在追悼会上诵读一下。

听说聂元梓一命归西了，离苦得乐，托体同山阿，在我国文革史上永垂不朽了。

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尤其是北京高校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对于聂元梓这个名字，不生疏——恐怕大多数还是“耳熟能详”。提起北大文革的“老佛爷”，大家也不陌生。关于她，最著名的事迹，就是毛泽东抬举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实实在在的“一举成名天下知”。

聂元梓晚年有两本大著，一本叫《聂元梓回忆录》，将近500页，2005年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另一本叫《我在文革漩涡中》，九百多页，2017年由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此时，聂元梓行年96岁多，已然无力撰述。估摸着，两本书，应该都是别人捉刀，弄出来的。后一本书的书名已经涉及到文革两个字，国内肯定不给出版。香港的出版社为什么愿意给聂元梓出版？就是因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名气很大，在中国“名气大”，甚至在国外也有“名气”。

聂元梓是文革的重要代表人物。文革史专家徐友渔的《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有一段评论说：“在文革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加害与受害往往并非泾渭分明。很多很多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在某一段时间和某个问题上，是加害者，在另一段时间和另一个问题上，是受害者。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强调自己受害的一面，用受害的一面掩饰加害于人的那一面。这一点，在聂元梓、吴法宪等人的回忆录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是徐友渔的原话。

聂元梓的两本书，各自提到“漩涡”这个字眼儿。在第一本书《聂元梓回忆录》第82页，有一节书，这节书的标题叫作“陷入社教运动的漩涡”。第二本书的书名，干脆就叫作《我在文革漩涡中》。我们中国老古话《增广贤文》里边说，“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聂元梓深陷在这两场政治运动的“漩涡”中，都有她自己植根于灵魂的内在因素，使得她“强势出头”。

我在这里试着按照时间顺序，讲述聂元梓的事情：

一、青年闯荡，投身共产革命；

二、中年坎坷，家庭屡生婚变；

三、社教和文革，两度领军“北大革命左派”，社教和文革两场政治运动，聂元梓都有“不同凡响”的表现；

四、专制残暴，痴迷沽名贪权；

五、晚景凄凉，不肯认罪反省；

六、妄图翻案，怏怏赍志而歿，享年98岁。

根据《聂元梓回忆录》所述，她1921年4月4日，生于河南省滑县南尖庄。河南省滑县还出了一个中共政坛的改革家赵紫阳。聂家，据聂元梓自称，跟赵紫阳还有些历史渊源——聂元梓从密云监狱保释、放归社会以后，贫病交加，赵紫阳并没有施以援手，拔救她于苦难之中。这是题外话，一笔带过。

《聂元梓回忆录》说，她滑县的富裕家庭，世代中医。这个家，还是中共滑县第一届县委成立的地方。据聂元梓称，她受到大哥聂真的影响，从小就有共产革命思想。1937年，聂元梓16周岁，青春妙龄，参加山西“牺盟会”学兵连。接下来，她的履历：1938年，17岁参加共产党，辗转“华北军政干部学校”、“中共华北局党校”，最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到抗战胜利后；1950年，在哈尔滨任市委理论处长，评定为行政12级，属于“高级干部”。

聂元梓见于文字记载的婚姻史：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聂元梓跟延安“中央党校”六部“班党支部副书记”吴宏毅自由恋爱结婚，1959年秋冬之际离婚，三个孩子都归聂元梓。当时吴宏毅是哈尔滨市副市长，因为“严重的作风问题”被隔离审查。到了1965年的深秋，聂元梓和老红军吴溉之结婚，见《聂元梓回忆录》第95页的记述。吴溉之，湖南省平江县人，生于1898年3月，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吴溉之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文化大革命”中成为“走资派”，受冲击，聂元梓这个时候正是骤然蹿红的政治明星。在无比强调“突出政治”的年代，二人政治境遇的差别，天上地下。聂元梓在《聂元梓回忆录》中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按照康生的指示，结束了这一段短暂的婚姻。

## 第一部分 社教篇

1960年6月，经过大哥聂真牵线、陆平同意接受，聂元梓调入北大，担任经济系

副主任。陆平当时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聂真当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

王学珍编印的《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第25页记载：“1962年11月，王庆淑调离哲学系后，由聂元梓接任总支书记职务。”而《聂元梓回忆录》第76页说：“一九六三年初春，我被调到哲学系，担任党总支书记。”这两个说法，时间差别不大，应该是王学珍说的更可靠一些，因为他能查档案，而聂元梓靠的是记忆。

从手头的史料来源看，查《北京大学纪事》，检索1962年和1963年的记事，找不到陆平校党委任命聂元梓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记载。在2008版《北京大学纪事》第707页，可以看到《校级党政干部》列表，查到哲学系，聂元梓列名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是哲学系的“一把手”。任宁芬和赵正义是党总支副书记。在列表中，系主任是郑昕（xīn），副主任是冯瑞芳和邓艾民。1963年，刚过“三年困难时期”，全民忍饥挨饿的日子刚刚有一点好转，哲学系党内“党总支书记选战”硝烟暂熄，余烟袅袅。

这时候，从上面布置和贯彻的“九评学习”、“学雷锋”、“加强思想改造”，又成为全校日常生活中的重头戏。

《聂元梓回忆录》第82页说，从1964年7月，她自己“陷入社教运动的漩涡”。整个北京大学搞“四清”试点，和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六中一样，占中宣部十个“社教”试点之一，怎么在北大独独聂元梓她“陷入社教运动的漩涡”呢？说来话长。

### 一、北大“社教运动”是中央的试点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一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史称《前十条》；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史称《后十条》。

1964年农村社教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1964年6月29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处长以上的干部会上，指定副部长张磐石，住到北京大学了解情况。

7月2日，张磐石为组长的中宣部调查组十个人进入北大进行调查研究。当天，随

同张磐石到北大的，有中宣部干部周其湘、唐联杰、阮铭。调查组住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

北大有两个招待所——南边，在学生宿舍区的44斋，是一个条件一般的招待所；北边，朗润园教工宿舍区，有一个“北招待所”，“北招待所”是比较“高级”的。不日，调查组其他成员刘仰峤、庞达等人陆续到校。刘仰峤是高教部副部长，庞达是中宣部干部。

恰巧7月2日这一天，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和第一副书记戈华都在市委参加会议，没有在学校。张磐石分别听取了教务长崔雄崑、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关于教学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汇报。在整个“调查”期间，调查组始终没有向北大党委讲明，来校的目的和任务。

7月3日，陆平和戈华专程回校，到“北招待所”看望张磐石，想着汇报学校工作。张磐石说，“你们安心开会，会后再谈”。中宣部下面有文化部、教育部，北大属于教育部管辖。所以，张磐石创办过《人民日报》，这个副部长跟陆平曾经担任过的铁道部副部长，含金量是大不相同的。当天晚上，陆平召开党委常委会，表态说：调查组要什么材料就给什么材料，要什么情况就如实汇报什么，责成“党办”主任负责与调查组联络和执行。按说，陆平在态度上是积极配合的。

校系两级负责干部，按照自己的分工，陆续向调查组做了汇报和谈话。

张磐石对于北大校系两级党政干部给他的汇报、谈话，全都不满意。他在7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聂元梓“主要还是讲了阶级斗争，而且揭发了一些问题。”张磐石在7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已经两周了，上边（指北大党委）躲着，不想谈，也不给东西。下边（指各系党总支书记）是有顾虑，不敢谈，也不给东西。似乎有意冷淡你，拖延你。只有哲学系（按：实指聂元梓），今天又主动来谈。”

哲学系是谁呢？不就是聂元梓嘛。作为北大社教积极分子，聂元梓已经主动向张磐石工作组靠拢，比起所有中层干部，她开始冒尖了。7月15日、7月16日，聂元梓都是主动送上门，找张磐石谈话，汇报情况、揭发问题。

调查组成员阮铭，一直参加谈话，他说：“聂元梓主要谈的，是有关哲学系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谈到哲学系党内斗争的情况，最后给校党委提了些意见，说党委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干部工作方面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张磐石对于涉及到党委的事情兴趣特别大。”这个有据可查，是阮铭在9月23日在哲学系小组会上的发言。

7月23日和25日，张磐石又两次找聶元梓谈话。聶元梓讲的主要内容是：“一、北大党委实际上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二、北大党委干部路线上的宗派主义和干部队伍政治上不纯；三、北大的问题要彻底解决，不仅从思想上，还要从组织上变革。”聶元梓说：“北大已经出了问题，资产阶级活动猖狂，从政治、思想、学术、教学、教研室工作等各方面看，资产阶级争夺青年够严重了”；“北大已经到了顶头，哲学系的工作到了最后界限，不容许拖了，要不然这个学校就垮了。要搞好就要革命。”她还说“根本问题是领导思想、领导作风，问题比较严重。……不仅从思想，还要从组织上变革，不是批评一下就能解决，不做一系列变革不行！”聶元梓讲的这些，在当时，政治性质都相当严重，够陆平校党委喝一壶的。

张磐石对聶元梓讲的这些情况和意见，十分重视，尤其是聶元梓讲的北大中层干部严重不纯的问题，认为是抓住了北大问题的突破口。于是乎，张磐石决定以两个课题，作为调查重点：一个是北大党员干部政治不纯的问题，第二个是哲学系党内长期斗争的问题。

关于“精简人员”，有一个谢甲林的调动问题。谢甲林是哲学系的在编人员，“困难时期”被“精简”。在王庆淑调离哲学系以前，谢甲林没有被列入初步精简名单。谢甲林也没有对王庆淑提过什么尖锐的批评。谢甲林的调离，是王庆淑离开哲学系以后，由党员行政负责人邓艾民、总支委员罗曼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包括张恩慈的意见）之后提出，由聶元梓拍板决定的，与王庆淑无关。谢甲林在文革中，成为“老佛爷”聶元梓的得力帮凶，这是后话。

陆平对哲学系和王庆淑问题的看法，跟张磐石有原则分歧。陆平认为，“对王庆淑问题的性质做出定性，是在北大中层干部中立起的第一个标兵，也是北京高校的第一个标兵。如果把弦定高了，都照着划下去，会牵连一串人。如果说王庆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批中层干部都是，将来站不住，再拉下来，问题会很大。那将损伤一大批干部。”

调查组张磐石约请北大校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崑和党委监委副书记，孟琳等人个别谈话，了解北大党员干部的情况和问题，也获得不少他所需要的材料。张磐石发现崔雄崑和孟琳是北大校党委领导核心中，自己可以依靠的两个人。这样，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青睐聶元梓、崔雄崑、孟琳等人，作为“可靠力量”。

8月29日，张磐石向中宣部写了一个《一号报告》。说：调查组7月2日到北大

后“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研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声称：“北大干部队伍在政治上严重不纯。”还说：“哲学系聂元梓同志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

张磐石调查组根据《一号报告》几点基本估计，向中宣部建议在北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拟定了《关于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计划（草稿）》。《计划》说：从11月起在北大开展社教运动，弄清北大在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搞清学校各级组织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等五项任务。关于工作队成员，计划说：除现有工作组32人外，从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宣传、文教部门以及全国高校抽调一百多人，在北大抽调优秀党员骨干30人。

10月22日，中宣部向张磐石传达：彭真、陆定一批准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这么着，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此正式开锣——彭真、陆定一这两个占据中共中央要津的“大员”敲响了北大“社教”的开场锣。

11月5日，中宣部开始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试点工作由工作队领导，张磐石担任社教工作队队长。工作队由五人小组领导。五人小组的成员是：张磐石（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庞达（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说起来，这五个人的来头都不小。

11月12日，社教工作队在机关总支党员大会上说：“工作组到北大以后，感到有一股阴影和工作队作对，搞阴谋活动。不相信工作组就是不相信中央。”会上点了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珮云、谢道渊的名。校党委派人了解哲学系整风情况，被指责为“与工作队唱对台戏”，北大党委书记们研究工作、请示上级，被指责为“秘密活动”、“阴谋活动”。

张磐石在调查组向中宣部汇报的《汇报提纲》中，提起聂元梓的谈话，说：“直到七月底，聂元梓同志向我们提出三个问题：（一）资产阶级向我们猖狂进攻，北大党委不抓；（二）哲学系党内长期斗争，党委支持坏干部；（三）党委在使用干部上有宗派

主义，领导干部队伍政治上不纯”。

11月14日，社教工作队出炉《在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运动试点的初步计划(修正稿)》，说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一）搞清学校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教育方针方面存在的问题；（二）搞清学校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状况，击退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政治、思想、学术等战线上的进攻；（三）搞清学校各级组织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四）搞清学校干部和师生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面貌和思想状况，整顿党团组织，清理全校师生员工以及住校家属的阶级成分，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五）清查学校后勤部门和理科各系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关于组织和领导方面，《计划》提出：在五人小组之下建立工作队，成立队党委，张磐石担任工作队党委书记兼工作队队长，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全校每个党总支范围内都要配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在工作队领导下独立作战。

北大本来有校党委，现在又组成一个“工作队”党委，搞“社教运动”，“社教运动”成了一个“二龙戏珠”的局面，此时绝大多数党总支已被夺权。

## 二、聂元梓是自己“跳入”北大“社教运动漩涡”的“左派”

11月15日，北大“社教工作队”公布人员组成，共为270人，不仅队伍庞大，而且工作队成员干部级别高——正处级的，算是“普通一兵”。张磐石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他欢迎各地的同志来共同作战，打一个大的会战。他在向大家介绍了调查过程及哲学、技物、西语、经济、地质地理、图书馆、政治和法律八个系的“问题”，说：“北大有几个总支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人事处、组织部的问题就更乱了。”他说：“哲学系正在进行的大论战，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北大阶级斗争的缩影。”他说：工作队已普遍进入各单位。口号是：“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重点揭发校系两级领导的主要问题，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张磐石一再表扬了聂元梓，说“聂汇报的恰恰是详细、清楚，有材料，有观点，并且观点比较敏锐、正确”。

11月18日，社教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召开全校社教积极分子大会，向他们介绍八个系存在的问题，说明北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

11月29日，社教工作队队长张磐石以“北京大学调查小组”名义，写了《北大调查组第二次报告》，即《二号报告》。《二号报告》说：我们调查组的工作到10月中旬已基本告一段落，从11月初开始，已在部分单位逐步转入社教。从全国调集的工作队

员170多人，已于11月中旬先后报到，边学习边进入阵地。《二号报告》列举了哲学系、技物系等几个系的情况后，说：北大党委的领导“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

12月1日，校长办公会开会，工作队负责人张磐石、刘仰峤列席会议。陆平向与会同志介绍了张磐石、刘仰峤，张磐石作了长篇发言。张磐石说，今年7月2日进入北大，研究在北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问题，十几个人，住一个月，调研了一些情况，中央要我们再继续调研，把北大作为大学社教试点，解剖一个麻雀，特别是领导思想、作风、路线等要好好研究一下。到10月中旬向中央汇报，我们提出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重新组织队伍，重新教育人，搞运动，里应外合，问题才容易暴露出来。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就在北大进行试点。现在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负责同志共100多人。11月20日基本到齐，分别到18个系及校部了解情况，找人谈话。大家要把问题搞深透，运动的时间会很长。要把运动和经常工作都搞好，有些能改的问题随时改。工作队计划从12月开始全校学习《双十条》。“九评”中的接班人五条标准也要好好学习，以此借鉴看看北大到底是什么问题？要摸索共产党如何办好学校，知识分子革命化的道路如何解决等重要问题。

1965年1月6日，社教工作队召开北大校党委扩大会，到会六十多人。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刘仰峤做报告。他说：我们学校的运动在党内阶级斗争的盖子已初步揭开，初步形成了一个积极分子队伍，工作队员已有二百多人。现在准备有步骤地把运动推向党外，发动大家揭发领导的问题。他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的领导骨干中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学校里首先是校党委。他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核心，集中力量打好阶级斗争这一仗。

### 三、北大“社教运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1月11日，张磐石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紧急会议”，做了报告。他说：北大全校总的斗争形势很好，十天来在全校二十个点上，全面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斗争气氛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生动活泼、热火朝天。他说：过去谁是哪一派，斗人的是哪些，被斗的是哪些，看不清楚。斗争起来以后，斗争的阵营比较清楚，有些想要暗藏已不太好藏。在斗争中谁是真积极，谁是假积极，谁积极十分，谁积极二分都看清楚了。他说：在斗争的烈火之下，牛鬼蛇神开始退却，有些顽固的集团开始分化，被斗的人开始动摇、彷徨。他说：在群众热火朝天的斗争之中，北大的陈规恶习，已经受到斗争烈

火的冲击。他说：北大社教运动第一阶段的斗争高潮已初步形成或接近形成，整个北大从校到系，二十条战线团团包围起来。他说：现在是至关重要的时刻，是决定胜负的时候，要抓住有利时机，乘胜前进。他说：不能盲目乐观不再前进，不能犹豫徘徊，坐失时机，这两种情况都是在革命上、政治上犯机会主义的错误。谁是革命者，谁是机会主义者，现在要大家抉择。一个礼拜内不前进就会犯错误。他表扬了几个工作组“斗争旗帜鲜明”，批评了几个工作组“斗争旗帜举得不高”，甚至“在斗争中还有倒退的，这很值得警惕。”张磐石要求大家“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关于敢于胜利的、严格遵守政策的、围歼敌人的有关文章”。工作队办公室根据他的指示，布置了八篇学习文件。前三篇是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第四篇是《关于重庆谈判》。

中宣部一位领导同志看到这个报告稿，感到“大为吃惊”，批评说：“斗争”、“斗争”，仅在第一部分就用了四十多次“斗争”，“斗争”一词前后还加上许多漂亮的形容词。斗、斗、斗就是革命派，不斗就是机会主义。但通篇报告就是不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讲“团结-批评-团结”。却要要在北大打一场淮海战役，把被批判的人当成敌人。以上批评见1965年4月29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在社教工作队骨干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记录稿存于北京大学综合档案馆。

这次紧急会议后，各单位“面对面的斗争”更加激烈，有的总支被定为“阶级报复”，有的总支被说成“两面政权、内外勾结”，许多总支书记被扣上敌我性质的大帽子。学校流传着这个单位“烂了”，那个单位“烂了”，北大“烂了”等流言。

工作队骨干阮铭说：“北大干部只见过江隆基、陆平这样的共产党，没见过真共产党，是从一个资产阶级的被窝，滚到另一个资产阶级的被窝”。聂元梓说：“过去北大不是真共产党，现在才有了真共产党”。有的工作队员对北大党员说：“把一切倒过来看，才能革命，还把干部当书记，就揭发不出问题”。

不难看出，聂元梓和工作队派驻哲学系“蹲点”的阮铭，两个“极左”的政治投机分子，在北大“社教”中就搞到一起，后来在文革中他们气味相投，都搞“打砸抢”，志同道合，结成死党。

#### 四、“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中央的通知中说：“现在把

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共有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也就简称为《二十三条》。其中第三条指出：“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由于习惯关系，此后“社教”与“四清”常常通用。

“社教”、“四清”，是中共政治运动史中的两个政治术语。1964年11月底毛泽东再一次听工作汇报时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通通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1964年12月27日，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派”的提法，刘少奇是不赞成的，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

1965年1月中旬，在学习周恩来总理政治工作报告过程中，有14个系的学生“揭阶级斗争的盖子”，给校系领导提意见。另有物理等三个系，在内部给校系领导贴了大字报。

1月23~24日，陆平、彭珮云先后在贯彻中央《二十三条》的市委全会（扩大）高等学校小组会上发言。（这里插一句：1951年2月，北京市委指示北大建立“党委会”，此前的北大党组织为“党总支”。所以，北京市委是北大校党委的“娘家”，特别是彭珮云直接的“娘家”。）陆平、彭珮云根据《二十三条》精神，联系北大社教运动的实际，对北大工作中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

陆平、彭珮云在“不得不尔”地肯定“社教运动”成绩的同时，对张磐石工作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批评：工作队把北大校党委和大多数总支撇在一边，没有实行三结合；对北大总的估计，特别是北大干部队伍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北大过去工作中有不少缺点、错误，但正如中央估计：“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北大也是如此；问题严重的干部只是极少数，不能因此就不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更不能由于干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就说成执行了资产阶级干部路线；对干部队伍应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张磐石工作队对北大干部不是重在表现，而是过于重视成分、出身、历史，这就意味着唯成分论；中央指示对干部要“严肃、积极、热情”，工作队领导也没有做到；

对北大许多领导干部不经说服教育，就给戴上大帽子进行批判斗争，党委书记6人（除冯定外）斗了5个人，常委14人中批判斗争了8人。校党委书记、副书记按照渠道，正常的向市委请示汇报，也被当做阴谋活动“追逼交代”。（此处“戴上大帽子”是指政治帽子。实在说，整个北大“社教运动”，没有打斗、游街、戴高帽子等过激行动的记述。另外，整个北大“社教运动”，在校内没有抓人、捕人、死人、自杀等情况。）

陆平、彭珮云说：各省市高校的领导干部，都在北大“社教试点”，影响很大，希望中央对北大社教工作加强领导，很好地贯彻《二十三条》，真正把运动搞好。陆平请参加北京市委组织的这个会议的张磐石工作队同志，把他的发言转给张磐石工作队党委。

1月31日，北大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和教务长崔雄崑召开大会，按照工作队的口径，向从湖北参加“四清”回来过春节的师生中的党员介绍北大社教运动进展情况。这时候，对陆平不满的戈华和崔雄崑，已然跻身于北大“校党委常委”这个层级的“社教左派队伍”。

2月9日，社教工作队党委召开队党委扩大会，听取校党委书记陆平对运动的意见，各系工作组长和校党委常委也参加了会议。陆平首先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对工作队和运动中批判他的一些问题做了说明，表示了不同意见（如对待工农学生为什么让一些工农学生提前毕业及干部政策等），对运动的有些做法提出批评和怀疑。如《二十三条》讲，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学校，教职员都是干部，但文件中所指主要应该是党、政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干部。中央指出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一般情况下是大多数，运动中揭发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但对干部如果缺乏历史的分析，大多数干部就不能依靠了。干部的家庭成分是应重视的，但如果不是“重在表现”，也会有片面性。我参加一些系的会，对主要干部的批判都提得很高。这次批判斗争的面，我不全了解，建议工作队党委研究一下，批斗了多少？妥不妥当？这牵涉到对北大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对于所谓两个党委“唱对台戏”问题，陆平讲了具体过程和事实，表示不同意这种指责，更不同意工作队干部在机关党员大会点名对几个书记、副书记的指责，而事先不和我们打招呼和事后进行各种追逼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

这一天，全校教职员党员、全体工作队员收听北京市委彭真书记关于《二十三条》的报告。

陆平、彭珮云的态度和回嘴回舌，激起工作队的怒火。2月17~18日，社教工作队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对2月9日陆平的发言进行批驳。工作队党委主要干部说：各系和机关（不包括常委）共揭发批判了52人，占北大全体教职员党员的4%，一般说，这些干部或轻或重地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不论从方针方法上或从结果上看，是基本上符合《二十三条》的，不发生斗争面宽的问题。有的工作组长说：我们系揭发批判了4个人，如按全系干部党员（教职员党员）算，还不到5%；按全系干部（教职员）算，还不到2%。有的组长说：关于唯成分论问题，我们系的积极分子中有50%是剥削家庭出身；四清领导小组10人中，有6人是剥削家庭出身，因而也没有唯成分论的问题。有的说：我们只斗了1个人，而且该斗，陆平是无中生有恶意攻击。至于这52名被揭批的干部占中层干部的比例是多少，却没有提及。

先验性地“有计划、按比例”划定斗争对象，“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每次都“扩大化”，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一大特色。

2月22日，中宣部长陆定一给中宣部所属的各工作队作报告，结合《二十三条》，回顾前一段工作，他宣讲了《二十三条》形成过程和重要性。陆定一指出：一部分同志认为我们的工作和《二十三条》完全符合，这种看法不好，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他说：“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的分子把持的，要夺权”，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夺权。即使在问题严重的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极少数。所以不要扩大打击面，不要红了眼，不要两肚子气，这不能解决问题。他强调要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实行三结合。对干部要“严肃、积极、热情”。他说：第16条讲落脚点，对我们就是要落脚到把教学、科研、生产劳动等工作搞好。工作队不管生产，这个问题反映最多。毛主席最近又讲，派工作队需要，但又危险，因为它不管生产，又总想多抓几个虱子。他说：第22条顶重要，就是要避免片面，反对形而上学，不能跳出圈子，越走越走向极端不好。他特别讲到北大，他说：关于陆平，我问了好多人，要从大的方面看他，许多事都是做得好的。当然，他有缺点、错误，但总的看，还是好人犯错误。北大工作中的问题，似乎看成主要责任都在陆平。可是反过来想想，主要责任是否在我们？我们下面还有教育部么！

现在搞成两肚子气。整人的，挨整的，双方都有气。双方都要学《二十三条》，检查自己的缺点。陆定一再次强调，不要以为过去的工作已经完全符合《二十三条》。

## 五、中央进一步干预北大“社教运动”

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北大社教运动。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会议。中央书记处对北大做出了基本估计：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书记处会议最后总结时，邓小平总书记对北大社教运动做了基本估计：北大的运动有成绩，肯定有缺点、错误，发生了“顶牛”现象。缺点、错误有几条：一是没有“三结合”，这问题不只是北大，中央担了责任；一是开始对北大估计错误，当做烂掉的单位去搞，以夺权问题对待，越搞越远；一是斗争方式有严重毛病。

中央书记处要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分头召集北大社教工作队和北大干部开会。按照中央《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统一认识，做好工作。

3月5日，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对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及北大校党委常委做报告，强调了几点：（一）干部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数，这一条很重要。他说：“性质严重的有没有？有的，比如中央党校的杨献珍、北大的冯至。”“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是极少数。”（二）《二十三条》规定：“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要夺权”。不是这样的单位就不能夺权。这点很重要。（三）“三结合”问题，这一条非常重要。在《二十三条》以前我们没有交代这个问题，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二十三条》公布已快两个月了，北大社教运动从学校到系都要根据第五条搞“三结合”。（四）第九条对干部的态度，要“严肃、积极、热情”。干部有错误，要去帮助他，听他的意见。有些干部有意见不能在会上讲，一讲就下不了楼，一辩就起哄。（五）第十六条，落脚到什么地方，“四清”要落脚到建设上，北大要落脚到教育上，把教育革命搞好，不是搞得人人小心谨慎、害怕。（六）“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七）第二十二条，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建议同志们再学学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

最后，陆定一宣布：把北大社教的五人领导小组扩大为八人小组，增加校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戈华、彭珮云。由八人小组来领导北大社教运动。这样，社教工作队张磐石狠整的陆平、彭珮云俩人，进入社教的领导班子。

## 六、北大社教运动“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

1965年3月9日，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从当天开始，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会。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作报告。他说：中央书记处指定我召开这次干部会，目的是要大家认真学习《二十三条》，按《二十三条》精神总结北大的工作，以便在自

觉的基础上，配合中宣部派到北大的工作队，把北大的社教运动进行到底。他阐述了《二十三条》的基本精神和重点条款，着重讲了第一条“形势”和第二条“运动的性质”。在讲到第九条“干部问题”时，他说：《二十三条》指出：对待干部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干部有四种，好的、比较好的，在一般情况下是多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不是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如果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内斗争就没有好结果，后患无穷。他要大家好好学习《二十三条》，学习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关于党内斗争的文章。讲到第十六条“‘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时，他说：小平同志指示，学校要落实到教学改革。他最后说：总之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对人对事，要一分为二，认真执行主席指示，我们的会就能开好。

工作队张磐石、刘仰峤参加了这个“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

3月12日，万里听取“国际饭店会议”北大各组召集人汇报讨论情况，传达中央书记处3月3日对北大的基本估计以及对北大工作队工作的估计。他回答了各组提出的一些问题，要求大家根据《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指示，总结工作，统一认识。

3月15日，万里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回答了各组提出的一些问题。最后说了几点：（一）运动主要由工作队来总结。（二）受批判的人与批判别人的人的关系应尽可能调整好，在批评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都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党内不团结就不能团结党外同志搞好工作。我担心的是党的事业。（三）对北大，对各系工作，对个人，都必须有个基本估计。希望大家自觉革命，绝不强迫做自我批评，不给任何压力。万里强调了“党内”，强调了“团结”。

3月19日，北大党员干部会（北大称为“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结束。万里书记肯定了会议的收获：很多人讲了心里话，做了自我批评；绝大多数同志表示了团结的愿望，表示愿意把社教运动搞好，把北大工作做好；有些同志之间还交了心，心情比较舒畅了。他希望受批判的同志对工作队不远千里来帮助北大搞革命要采取真诚欢迎态度。张磐石队长讲话：这次会很重要，家里也在总结，过去工作有缺点，《二十三条》讲，根本方法是三结合，不执行就要走到夺权。回去后，“三结合”一起总结，共同把运动搞好。

中央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张子意副部长给工作队全体队员做报告，根据《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指示精神讲工作队的工作。他在肯定前一段社教的成绩的同时，着重

讲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三结合问题：按《二十三条》和书记处精神来检查，在北大运动中我们没有实行三结合。三结合就是共同领导，从调查组开始，就把北大党委撇在一边，实质上摆着夺权的样子。（二）批判面过宽。20个总支书记，批判了18个，占90%。如果其他学校都这样搞，能受得了？在座的许多都是院校的领导、总支书记，按这样搞法，你们回去都得挨批判，你们受得了吗？所以书记处一再强调，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三）有的单位出现追逼、粗暴过火的现象，不符合党内斗争原则。有些场合混淆了敌我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出现追组织、追关系、扣大帽子，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敌我矛盾。（四）唯成分论问题，这方面也要认真检查一下。搞唯成分论就会冲淡两条道路的斗争，走到邪路上去，书记处很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五）《二十三条》下来以后一个时期，工作队有些被动，很长一个时期工作队简报也没有出，好像《二十三条》下来后无声无息。我们把缺点、错误讲够，检查够，就主动了。这也不会影响群众积极性。

中宣部张子意副部长说二十个总支书记批判了18个，都是现任的。批判的总支书记实际上还不止于这18个，表面看，现任哲学系的聂元梓和技术物理系戴新民（按：两个“社教积极分子”）没有批判，但是批判了他们的前任总支书记石幼珊和王庆淑，不但批了，而且批得格外频繁、猛烈、高调，完全当作“敌我性质”整的。就是说，二十个总支书记，一个不漏，全都批了。

到了文革，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掌控“校文革”，把其他十九个总支书记都给打倒，实现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专政”。

3月20日，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常溪萍在3月17日给总书记邓小平等写信，反映对工作队长、队党委书记张磐石的意见，并建议中央派人检查张磐石在北大的工作。

常溪萍有领导经验、有一定的政策水平，他按照正常的渠道，向“组织上”反映了自己在“北大社教”中对于张磐石“极左”做法的意见。他后来被聂元梓、孙蓬一诬为“北大社教”的“叛徒”，追到上海去残酷斗争，两年后竟至迫害至死，家破人亡。

3月20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约常溪萍副书记谈了话，并写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领导同志。纪要中列举事实，反映张磐石自《二十三条》公布以来，直到中央书记处讨论北大社教工作会议以后，对《二十三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的错误态度、错误做法以及错误的工作作风。纪要说，常溪萍认为张磐石的指导

思想和做法许多是不符合《二十三条》和中央指示精神的，但张磐石却独断专行，把一些正确意见视为“右倾”，并调动了几个组长的工作。常溪萍说：“因为事关全国高等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样板，建议中央派人检查。”

3月21日，中宣部长陆定一与校党委书记陆平谈话，陆定一对陆平说：毛主席说了，你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放心好了。以后第一书记还是要你做下去。名声不好了，这不要在乎，向同志们讲清楚就行了。揭发出来的问题，有的是对的，有的不对。今后同志们好好合作，把工作搞好。北大的问题，根本是党的问题，这几年教育不够，你1961年后有点右，我们也有。你在市委的发言，我们看了，也了解你当时的心情。回校后，陆平向校党委常委汇报了谈话内容。

3月24日，陆平校长召开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会议，要求大家解除在社教中的隔阂，团结起来向前看，并说明经与工作队负责人张磐石商量，应恢复杨汝佶看文件的权利。陆平说，社教运动中有的同志批判了别人主要是基于革命的热情，被批判的同志应抱“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3月25日，社教工作队党委和校党委共同组织召开全校参加运动的党员副处级以上干部会，传达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给工作队员的报告，播放张子意副部长的报告录音。

3月26日，社教工作队党委书记张磐石和校党委书记陆平共同主持党员干部大会。“二龙治水”，表征社教工作队不能一家独大了。

由八人领导小组成员宋硕传达万里在国际饭店会议的讲话。全体工作队员、积极分子、校党委委员、总支正副书记、正副系主任、正副处长共900人参加。张磐石、陆平在会上讲了话。

3月30日，邓小平总书记对常溪萍与中办同志的谈话纪要做了批示，批评张磐石在北大工作中，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

彭真书记也在文中做了注批：直到最近，就是说《二十三条》已经下达这么久了，中央书记处也为北大开过会了，有的同志还是有错误怕检讨，而且听不得不同的意见。

4月1日，社教工作队负责人与北大校党委常委开会。工作队长张磐石讲：中宣部负责同志讲，中央领导同志对北大运动很关心，周总理最近还问到北大运动情况。领导同志说：北大工作队不仅仅是北大的问题，工作好坏还影响到全国。中央书记处要北大

作出个总结来，供全国参考。北大社教运动不仅北大党委有意见，工作队内部也不一致，需要大家把心里话讲出来，经验才能总结好。另一方面，北大社教运动，全国调来这么多人，想来取经。究竟正面有什么经验，反面的缺点错误、反面经验是什么？不能总结出经验让同志们带回去，也会使各地的同志和党委失望，是对他们不负责任。所以中宣部建议抽出60来人去总结，昨晚已达65人，可能还要增加些。主要是工作队党委委员、组长和骨干，也有对立面，集中到饭店开会，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把运动搞到底。张磐石说：中央讲了，陆平同志是好同志，有某些错误，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大家是有共同语言的。校内的工作要靠校常委、陆平同志。工作队办公室主任胡沙说：（一）出去开会期间（“出去开会”指的是“北大社教”中的“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各系由总支书记、工作组共同领导，向校常委、陆平同志汇报；（二）张子意和万里两个报告向参加运动的全体党员传达。

4月2日，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指示精神，认真总结北大社教运动的经验。中央宣传部决定自今日起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四清”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

4月3日，校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陆平传达工作队队长张磐石4月1日在常委会上的指示，研究部署当前工作：（一）在全体党员中传达学习张子意、万里报告，全党都积极做团结工作，校系领导干部亲自做具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的工作，和工作组密切配合，保证和工作组的团结。（二）积极进行检查总结工作的准备工作。（三）抓好经常工作。

同日，校党委召开全体参加运动的党员大会，收听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的报告录音。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传达万里在“国际饭店”北大干部会上的讲话。

4月5日，校党委常委在工作队队部召开工作组代理组长联席会议，商议如何组织张子意、万里两个报告的讨论问题。

4月16日，总支书记与工作组代理组长联席会，向陆平及校常委汇报党员讨论万里、张子意两个报告的情况，并布置下一步工作。

4月28~29日，中宣部在民族饭店召开的北大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举行扩大会议，全体工作队员和北大校系主要干部参加。28日，校党委书记陆平发了言，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讲话。29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讲了话。三位领导人总结了近一个月来会议的情况，总结了北大社教运动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工

作队长张磐石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批评，指出：他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对抗《二十三条》，拒不执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二十三条》发布后，他患得患失，反对执行《二十三条》，拒绝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甚至引导工作队同中央顶牛。在组织上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

陆定一部长代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布：撤销张磐石同志北大工作队队长职务，由许立群同志任北大工作队队长；八人小组改为九人小组，增加常溪萍同志为小组成员；许立群同志为九人小组组长。

撤销张磐石北大工作队队长职务，也就是停止他的“社教”极左路线。北大校内的“左派”也就失去了组织靠山，开始走下坡路。

5月5日，全体教职员及研究生党员大会，收听4月28日陆平、许立群在民族饭店北大工作队会上的讲话录音。

5月6日，全体教职员及研究生党员大会，收听4月29日张子意、陆定一在民族饭店北大工作队会上的讲话录音。

5月7日工作队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和北大教职员党支部书记、行政科长以上及校党委机关干部参加的大会。由九人领导小组组长、新任工作队长、队党委书记许立群布置工作。他说：根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指示，5月4日九人小组开了第一次会议做了几条决定，队党委和校党委也分别进行了研究。现将九人小组决定的几件工作作一说明：

（一）工作队与校党委要集中力量抓两件事，一是抓教学秩序。农村“四清”要落到生产建设上，学校“四清”要落脚到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上。中央领导同志批评张磐石同志进北大八个月没有抓教学。现在一定要好好抓一下。校党委多抓，工作队也要抓。二是贯彻国际饭店和民族饭店两个会议的精神，使大家领会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前队队长的主要错误，就是不执行《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不按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办事，使得北大党内团结受到严重损害。（二）坚持三结合的工作方法，系一级吸收总支同志共同领导运动。目前以工作队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总支为主。（三）北大干部已吸收到工作队的，同意两边会议都通知参加，逐步过渡到回原单位。其他，有分工等等事项，从略。

5月17日，校党委书记陆平召开汇报会，听取各系对中央关于北大社教问题指示的讨论情况，大家同意中央关于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所犯错误的指示，认为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被批判同志之间隔阂还很深，在一些问题上分歧严重。

5月24日，北大社教工作队的教学组调查了政治系、中文系和物理系的教学秩序之后，向工作队党委和工作队领导小组提出书面汇报。汇报说：（一）学校应做出规定，解决目前存在的教学秩序中的混乱现象，要进行一次“红专教育”，把学生的革命化落实到学习上。（二）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干部需要提高政策水平，才能引导学生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目前学生中出现不少政策界线不清的事，未能及时进行教育。（三）必须下决心配备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四）各级领导要改进领导方法，经常深入学生群众。（五）团干部要定期改选，实行轮换，使他们有可能达到又红又专。寓意是长期让学生担任团干部固定不变，不利于他们“又红又专”。

5月26日，社教工作队召开工作队员和学校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和机关副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会。许立群队长报告工作。他说：上次会后，工作进展比较快。放过四个录音后，大部分同志都认清了张磐石同志的错误，团结改进了，党的威信逐渐恢复。有些工作组向被错批的同志道了歉，同志们反映好，到底是来革命的。他提出：高校“四清”究竟怎么搞？各地同志来取经，总得大家一起研究个条文，关于高校要解决什么问题，他提了五个问题供讨论参考。

关于“四清”步骤，是否大体分几个阶段：第一段：党内整风。主要是党员干部、党员教师，学习《二十三条》及毛主席讲话等文件，然后两级检查工作、洗手洗澡，发动党员干部提意见。第二段：进行自我教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三段：准备教改、提高教学质量。主要在这三段。第四段：清经济，主要是行政部门的事。第五段：对敌斗争，确实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再斗争，未弄清前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还有派不派工作队等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下一步清理工作怎么搞？（一）首先弄清高校究竟应解决什么问题；（二）如何清理，目前由工作队把运动的是非做个总结有困难，可在三结合会上把过头的地方说一说。可参考3月19日张子意同志讲话。他说，从现在到月底先集中讨论高校社教怎么搞？解决些什么问题。

明天把初稿印发下去，作为讨论的参考。

6月3日，校党委召开扩大会，陆平提出运动中对校系领导干部的要求：（一）统一思想，要统一到《二十三条》上来；（二）领导干部要以自觉革命的态度来参加清理工作；（三）运动清理完以后，要迅速转到检查总结工作。

6月14日，校党委召开扩大会，布置当前工作。陆平书记说：出去“四清”的，北

京地区的已经回来了，湖北“四清”的要7月上旬回来。9月份要有大批师生下去“四清”，通县、湖北回来1600人，要下去的3500人，下半年怎么安排课程要很好研究。毕业生工作要做好，今年招生任务1560人，要调70多名干部搞好招生工作。还有三线建设，有些单位明年要搬过去，要作准备。九人小组商议采取如下措施：（一）干部集中精力抓好当前工作；（二）工作队部分骨干总结经验，提出高等学校怎样进行社教的文件草稿；（三）北大社教一定要搞到底。

当前要把下学期教学计划落实；对外地“四清”回来的同志要热情欢迎，搞好思想总结，下去的要定人作准备；做好毕业生思想工作和建党工作；成立五人小组负责招生工作。

6月29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向北大工作队全体队员和北大党员干部做报告。讲了八个问题：（一）北大形势好还是坏？我看北大形势好。有人说乱，问题暴露出来好，乱而后治，开始认识它，就是好形势。（二）北大社教试点很有收获。（彭真绝对想不到，一年以后文革从北大这个“社教试点”爆发，“收获”了十年浩劫。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正面经验是收获，反面经验也是收获，反面经验总结后就成了宝贵财富。试点如侦察员探路，左边右边的路都探了，走了许多弯路，才使后面大部队少走冤枉路。所以试点单位搞对的、搞错的都是对党的事业的贡献。张磐石的错误也要分析，前一段的错误不能都怨他，我们也有责任，但《二十三条》他不执行，当没那么回事一样，我们就不能代他负责了。如果北大是资本主义熔炉，全国还有几个社会主义熔炉？北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全国还有多少无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彭真绝对想不到，1966年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明白宣示，他认为“我们的学校”一直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不过，那时候，彭真已经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罢官、接受批斗了。）如果全国的大学、中学，都按张磐石那套搞法，行不行？关于陆平同志，我说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毛主席说：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他加了量。（三）当前北大要防止的主要偏向是什么：工作队到北大后有一段时间主要偏差是一部分同志否定一切、一团漆黑。现在应该防止的主要偏向是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北大万事大吉了。（四）从根本上把大是大非问题解决好。办法是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整风的、批评自我批评的办法。（五）解放思想，增强党性。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去掉拒绝批评的挡箭牌，解放思想。对批评自我批评

的态度怎样，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标准。（六）高等学校“四清”必须密切结合教学实践并落实到教学改革上。前一段工作队最大缺点之一是没抓教学。（七）关于“重在表现”及如何看待历史、出身、成分问题。“重在表现”就是列宁讲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如果只按出身，那就把现在的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搞出去了。这是个战略方针问题。出身、历史要看，有烙印，但要重表现。（八）健全校、系两级党的领导核心。有德有才的，要破点格，提拔一些年轻人。他最后说：归纳起来，当前有三个问题，一是把大是大非弄清楚，把已成熟的问题解决；二是解决北大党内团结问题；三是抓紧教学工作。

7月1日，校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讨论关于运动的部署。陆平书记说：九人小组开会研究，根据彭真同志报告精神，为加快运动的进展，准备利用暑假，校系领导干部集中清理思想、总结工作。他说：学校当前形势，彭真同志讲的很清楚，“否定一切”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防止北大干部对学校的问题认识不够。彭真同志报告是北大党员增强党性、加强团结的重要武器。因此要（一）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增强党性，端正态度。（二）校系两级总结工作。首先党委总结，各系根据党委总结把本系主要问题总结一下。（三）各级干部主要是校系领导干部清理思想，按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自觉革命，别人帮助。他说：工作队员已经中央批准放暑假，我们有九人小组领导，有市委、中宣部、高教部领导，应该有信心把这一次学习搞好。

7月6日，校党委召开教职员支部副书记、教研室副主任、副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会。布置认真学习彭真报告，在学习的基础上，三级干部（主要是校系两级）清理思想，总结工作。支部不要求总结工作。

### 七、北大社教运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

7月26日，校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陆平传达市委、中宣部、高教部的通知：28日集中，定于29日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参加范围：校系两级主要领导干部、吸收部分支部干部和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指聂元梓等“社教”积极分子）参加。

7月29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开始。到会二百五十多人，会议由市委、中宣部、高教部及原九人小组成员共14人组成领导小组。中宣部许立群任组长、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为副组长。

许立群对开幕词做了说明：（一）为什么要开这个会：6月29日彭真同志报告后，

大家经过学习，有了初步提高，为了集中精力首先把北大的党整好，因此三个单位一致同意召开这个会。（几个月后，许立群落入彭真《二月提纲》的臭水沟。）要办好北大，必须把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到底。当前深入开展社教运动，就要把存在的严重的四不清（主要是政治上、思想上）问题，认真地系统地加以解决，其关键就在于党，要把党整好。参加会的干部整好了，再帮助一般党员。希望每个同志要自觉革命，首先清理自己，清政治、清思想，去掉资产阶级的东西，增强党性。这次会议的中心就是增强党性，能不能自觉革命，是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是测量党性的重要标准。（二）怎样清理：对这几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认识如何？立场是否坚定？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是否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人对己是否一分为二？在这次运动中有什么经验教训？（三）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四）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学习文件已印发，主要是毛主席关于增强党性、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反对个人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等文件。

邓拓也讲了话。会后，各组学习文件，自己清理思想，互相谈心。

8月23日，领导小组召开整风学习会全体会议。邓拓主持。首先领导小组成员宋硕汇报学习情况。他说：经过学习文件，自5日开始清理。现已有243位同志做了清理，占到会人数百分之九十多。上周开始互相批评，吸取教训，大家感到收获不小。（一）党性有所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气氛有所增进。（二）对张磐石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和错误的斗争方法及对北大党内的影响，认识有所提高，与他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划清了界限。（三）通过自觉革命、互相交心、互相帮助，运动中产生的隔阂减少了。他说：大多数同志自觉革命精神比较好，有些同志还没有完全摆脱个人情绪，极少数同志认识很差。许立群说：前一段有收获，下一步，领导小组研究，继续提倡自觉革命，增强党性，进一步解决大是大非问题。准备开几次大会，由常委同志将自己清理的内容在会上讲讲，但不开大会提意见，意见在小组提。磐石同志把许多干部说成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调查研究，乱提高，他的错误影响很大，领导同志说：张磐石到北大来把党弄分裂了，要充分认识。我们要坚持批评自我批评，要和风细雨，总结经验，增强党性。下星期大会小会结合。

8月25日，学校召开各系系主任联席会议，由张群玉副教务长汇报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她说，1964年春节以来，毛主席对教育工作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由于我校是社

教运动的“试点单位”，运动已开展一年，暑假又开展整风，未能深入研究。大的教改有困难，但应做到一开学就有一个好的教学秩序，使同学在下学期一开学就能学得比较主动，保证学生德智体三方面都得到发展。我们要在教学工作中创造自己的经验，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又不是修正主义的。

8月25~9月1日，陆平、戈华等七人在大会做了清理检查，各小组进行讨论。

9月1日，整风学习会大会告一段落。宋硕布置明天继续小组讨论，除对校常委提意见外，希望用一两天对整个学习讨论一下，学得怎么样，还有哪些问题未解决，会议如何进行，也希望听取大家意见。

9月4日，整风学习会（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举行全体大会，宣布大部分单位告一段落。许立群说：除哲学、经济、技物二个组和校常委还需要继续讨论外，其他大部分单位告一段落。

陆平对会议做简要小结，布置了回校后的工作。他说：这次会议有很大收获，（一）增强了党性，党内原则空气比以前浓厚了。许多同志说，领导检查认真对大家有启发，大家感到个人主义是危害党的。（二）提高了对张磐石同志错误及其危害性的认识，说张磐石把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带到党内，伤害了受批判的同志，也伤害了跟他走的同志，大家深有体会。（三）对过去几年的错误做了初步清理，对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有所解决，有所前进。（四）在学习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继续党内优良传统、恢复党内正常生活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下一步工作：除“哲学、经济、技物”三个系和常委同志外，其他大多数单位可以回校。回去后，对全体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认识，清除影响，正确吸取经验教训，增强党性。但对未参加运动的党员、干部，不要求作清理。首先传达彭真同志6月29日报告，组织学习；学习这次会议的开幕词和会议学习文件；分系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许立群、邓拓同志讲话及校常委同志的清理）；学习过程中，总支正副书记、党员正副系主任向全系党员作清理、检查，听取意见；在组织生活中讨论前段社教中的经验教训。同时，要把经常工作抓起来。

10月6~7日，北大校党委扩大会讨论1958年以来工作的检查总结。10月25日，北大校党委扩大会继续讨论1958年以来的工作检查总结。党委认为这些年来工作中发生过不少缺点错误，但总的讲，成绩是主要的。说北大党委“实际上走了资产阶级的方向道路”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校党委和常委用了较多时间检查讨论了干部工作和党建工作，认为虽然大多数党员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不少人自觉改造的精神不够，

但总的说来，北大党组织是好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努力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工作是积极的。说北大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是在“唯成分论”思想指导下的错误结论。

10月，北大各总支都在组织党员学习，总支正副书记、党员正副系主任在党员大会上做了清理、检查。党员都在支部生活中联系思想提高认识、澄清事实、分清是非、检查缺点、增强党性。同时也对张磐石的错误指导思想和做法，提出了批评。

1966年1月24日，校党委常委开会，决定25日党员干部会的议程为：（一）把党员干部整风学习的结果向大家报告，澄清是非，提高认识，增强团结；（二）布置当前工作和今后任务。会上，要说明“社教工作队”不再回来了。

北大的“社教运动”实际上，到这个时候算是完全结束了。北大“社教运动”第一号“左派积极分子”聶元梓，末路在望。

【述往】

##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

——逃犯·乞丐·列车员

陆伟国

武斗之后，我又回家了，心中充满了悲切和沉重。从没想到，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竟然会落到这种地步。

回家也并不另外破费，省下的伙食费，能顶个车票钱。这时坐车已经要买票。买票倒是很方便，东校门外往南一百米，就有个卖预售票的地方，在学校南围墙外很少有人走的一条小路的路口。那条小路，是个死胡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现在有名字了，叫人民大学南路）。和东校门相对的西校门外的南侧，也有这样一条东西向的小路，也是个很少有人走的死胡同。可能这两条小路本是一条路，中间被断开了。西校门外的这条小路，进去后，在一个很偏僻、很不起眼的地方，竟是詹天佑的墓。这是我在二年级到处“瞎走”时偶然发现的。这个墓，在1982年5月迁到了延庆青龙桥。

这次上车，因为没有串连的，更少有探亲访友的，所以车上比较空。我的对面是个空座。半夜时，忽然有个中年男子过来，极迅速地坐到我对面，马上就低下头趴在桌上。他衣着不整，胡子拉碴，什么也没带，这在当时也常见。但他的这番动作，使我挺在意。

天快亮时，他抬起了头，和我说起了话。我是个不习惯和别人多说话的人。现在有

个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其实那时更是如此。不是怕受骗，而是怕被告发。被告了，你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背后告了你什么。不多说话，是种自我保护的被迫与无奈。所以，我也就哼哼着，并未去多理会。

两、三句话之后，他突然说：“我是从里面跑出来的。”

我心里咯蹬一下，在想，他告诉我这个干吗呢？是看我不像个强悍刁钻之人，来讲些无处可诉的话；还是要吓住我，让他几分，给他点钱，或给点吃的什么？我也没有啊。

我就跟他说：这事，你不要告诉我，也不要告诉别人。你要是渴了，就喝点水吧。

我把茶缸推了过去，也不准备要了。

他惺惺然，点点头，极轻微地一笑，不说话了，接过缸子，猛地喝了起来。

这时，有个铁路警察往这边过来。他又愣愣地看着我，我随意地说：“快到了吧？”

他点点头，轻声地应着：“唔，唔。”

那警察并没有盘问，一走而过。我在想，他这前后可能是心里紧张、手足无措的一种表现。当然，人逢此境，能这样，已属不易了。

要问：那你怎么没有向警察揭发他呢？这不是在包庇逃犯吗？这也好回答。因为我不能证实他说的是真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也不用去证。更何况，那年头受冤的落难之人多了。真的坏人，正跳得高呢。

天刚亮时，他下车走了，也是极快地走了，消失在车厢门口。在那最后的一瞬，他回头看了我一下。

这时候回到上海，无事可做。也就是有时抱着一岁的小侄女，上街走走。

一天晚上，走过四川北路。见一个中年妇女，显然已经疯了，蓬乱的头发，赤裸着上身，干瘪的双乳下垂，痴痴地站在路灯下不动，嘴里喃喃地不知说些什么。一群七八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围着观看。他们说着，笑着，叫着，跳着，倒也没有动手。旁边的行人，川流不息，却个个熟视无睹，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更没有一个人去说一句，去管一管。我也是，没敢看第二眼，也是匆匆而过。

人性都已经麻木到这样了。

我也是胆怯和麻木了，再没有两年前在列车上为被打残的老太太遮挡一下的勇气和力量。

都见过了那么多的死人。黄浦江上飘浮的尸体。永安大楼跳下自杀的人，砸到裙楼后，那碎裂的人体四处飞迸，寸寸断肠都挂到了路人自行车的把手上。一个精神病，算

什么呢，已经触动不了人们满是创伤的神经。

她肯定是遇到了很大的不幸，她的家庭肯定是遇到了很大的不幸。可是街上的人，也都有着他们各自的不幸。人人都已经折断了翅膀，都已经无法伸出帮扶的手。不管他们的良心还在，还是蒙上了阴影。

这是我们社会的大不幸。这是我们民族的大不幸。

我走着，心里一阵阵地酸楚。

我走着，为这位妇女的不幸而酸楚。

我走着，为千千万万的受害者而酸楚。

我走着，为我们社会、为我们民族的大不幸而酸楚。

两个多月之后，我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该分配了吧？便又去了学校。

从上海回校时，在济南下车，游玩了一天，看了看大明湖、趵突泉和南山烈士陵园。中午在饭馆吃面条时，看见了有几个要饭吃的、衣衫褴褛的乞丐。拿着破烂的碗，伸着肮脏的手，反复地哀求着：“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乞丐，心里很有感触。以前，因为是在上海，即使是困难时期那几年，国家对大城市有重点保障，还能吃上进口面粉，再加之父母的全力呵护，自己的生活大体还过得去。所以，虽身在困难时期，却没有见过艰难的一幕。相反，是在文革之中，当政者十分注重政治形象的时候，看到了以前课堂上老师说解放前才有的这个情景，很使我愕然。我总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社会主义不应该有这种境况。社会主义，先不说“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些话，至少要有起码的社会保障，不应该有贫困到没饭吃、没衣穿，而没有人管，被迫上街乞讨。只要还有这种情况存在，就称不上是社会主义，至少不能说是像样的、问心无愧的社会主义。直到今天，我仍然这么想，尽管街上还有各种真的和假的乞丐。

那时候的革命宣传，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济南上车后，一位列车员在车厢里就向大家宣讲起来：“革命的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现在我来向大伙讲讲革命道理，今天就讲讲反修防修、批判修正主义。这个苏联修正主义啊，真是王八蛋！以前，我们还喊它是苏联老大哥，呸！”一片吐沫星飞了出来，吓得坐在他前面的几个乘客赶忙扭头。

这位列车员看来也是练出来了，根本没管这些，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讲：“现在他妈的变修了、变坏了。当初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流血牺牲，死了多少战士，但他们现在反过来向我们要子弹钱，多卑鄙呀！而且趁着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吃不饱饭的时候，才

来向我们要钱。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给他！就算他不要，我们也给他。就算自己饿肚子，也给他。他妈的，他们算什么东西，不欠他们的。”列车员的脸上同时显示出愤恨至极的表情。（说明：关于苏联政府的“逼债问题”，请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的一篇文章“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那里面，对此有所说明。据该文说，在苏联历届政府中，对华援助最多的，恰恰是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

接着，列车员话锋一转，换了一种极为鄙视的表情，说：“你们不要以为修正主义就能过上什么好日子。他们吃的是什么东西呀？还赶不上我们呢。你们看，我带来了一块黑面包。”

这时，他从口袋拿出一块用报纸裹着的東西，打开报纸，里面是一块暗黑的粗糙的发了霉的面包片。他捧着这片面包向左右移动展示，又对大家说：“你们看啊，苏联的老百姓就吃这个啊。这么黑的东西，狗都不吃。苏联人民群众遭罪啦。所以我们一定要大搞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不然也要像苏联那样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亡党亡国，也要吃这种黑东西，甚至还要千百万人头落地。请同志们想一想，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苏联变修了，我们中国人民肩上的世界革命的任务，就大大加重了。以前，我们是说，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现在，苏联东欧变修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去解放全世界四分之三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了！世界革命的重担，全靠我们啦！同志们，这是个多么艰巨而又光荣神圣的任务啊！”

列车员展示给大家看的，是一块从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上弄来的燕麦面包片，大概是时间长了，都长了霉斑。中国的老百姓没见过那东西，咋一看，以为很黑很粗糙很不好吃。其实，燕麦面包本该是咖啡色，口感较好，营养也比小麦粉的要好，是俄罗斯人民喜欢的食品。为了增强反修防修的宣传效果，真是挖空心思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真佩服一个普通的列车员都能有这样高超的表演技巧，革命真是能锻炼人、培养人啊。

顺便讲一句，我们通常说面包是用“面粉”做的。其实，这个说法不够确切。“面粉”这个词的本义是指粉末状的物体，北方称之为面，南方称之为粉，合起来叫做面粉，只说明物理状态，不说明化学成分。它的标准学名就是叫“小麦粉”。

【文摘】

## 大英雄 真名士

### ——北师大教授石盘

佚名

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动员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大气磅礴，诗情洋溢地宣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假若他自信地认为他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就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也能够接受理论的质疑。遗憾的是，毛泽东却认为真理只有他才拥有垄断权，拒绝任何的检验与质疑，并且对于任何人的任何质疑都要置之死地而后快。这里我介绍一位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敢于质疑，敢于否定，敢于公开反对的大无畏的勇士、北师大教授石盘。

这是反右运动之后的故事了。反右运动，打右派最多的大学当然是北京大学，但打知名教授最多的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石盘是北师大政教系的教授。关于北师大反右的情况，我读了北师大的右派学生雷一宁、李受山写的回忆文章，才有了较多的了解。北师大是打教师右派最多最狠的一个高校。北师大有一级教授6人，在高校中极为少有，但有4人打了右派。他们是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都是各自学术领域的权威专家。中文系打右派的二级三级教授有穆木天、彭慧、李长之、俞敏、陈秋帆，也都是一时的名流，副教授启功更是书法界的“国宝”，也打了右派。在政教专业方面，何廷杰教授更是在全校批斗的重点人物。

处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里的石盘，竟然不顾前车之覆，不引以为鉴，赤膊上阵，在1958年“借交心向党进攻”，不怕坐牢，不怕砍头，只期望“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精神多么伟大！让我们默检索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向党交心运动》，发现了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1月19日的文章，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盘借交心向党进攻》。这位石盘教授，在惊天动地的反右运动开展了一年之后，竟然以破釜沉舟精神，坚信真理在他自己一边，无所顾忌地“借交心向党进攻”。他对于苏联、

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作出了全盘的反思与否定。他才真是属于毛泽东所赞颂的那种“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优秀人物”。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最后的遭遇，但可以说，他敢于奋斗牺牲的精神，确实是可歌可泣的。他才是探索真理的前驱！他说：“为真理受难而牺牲是光荣的。”古人云：“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位石盘教授可谓名符其实的“大英雄”、“真名士”，可歌可泣，令人肃然起敬！

1958年，石盘四十二岁，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本人成份是学生，原具有初中文化程度。1938年到延安，后到抗大，很快就入了党。曾在延安保安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在延安曾犯过错误，受过处分。1949年到中宣部工作，过去曾数次提出退党，1952年终于退党，调到教育部工作，后调到师范大学，评为三级教授。1956年，要求重新入党。他说，“我1956年要求重新入党，这主要是我爱人和一些朋友的外力推动，我自己劲头并不大。但不管如何说，我1952年退党总是错了，这点我自己很痛心，尽管我认为这个党的路线政策根本错了，那么我也应该留在党内，作一个党内反对派。在党内用提高党员认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实现自己的理想，退了党就不好办了。”

石盘主动退党后，一度有点后悔，但不是因为名誉地位的损失，而是认为留在党内，可以“做一个党内反对派”，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当然显得幼稚，甚至于狂妄，但这正是他在中共体制内20年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的结果。其情可悲可叹！据新华社北京电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石盘，借交心向党进攻，暴露出极端的反动思想。第一，石盘认为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变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新的特权等级社会，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工农群众没有当家作主。石盘最根本的反动思想是他认为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变质，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心目中的共产党和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的特权等级的社会。这个特权等级是指党和国家干部，也包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他说，在这些国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成果并不是首先归工农群众所有，而是首先被这个特权等级所占有。政治权利也是掌握在这个特权等级手中，工农群众并没有当家作主。还说，党没有遵守列宁的遗嘱将大批工人提拔到中央委员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来工作。石盘认为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苏联工农的生活比十月革命以后改善得并不大，但特权等级的生活却提得太高了。我1950年到苏联去了一次，看到很多工人生活很苦，农民就更苦了。苏联让我们看的集体农庄都是最好的，坏的根本不让我们看。但是我们

在路上看到乡下有很多小村子，猪也是放在屋子里，和中国农村差不多。”石盘认为中国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入城后党的路线政策。一切都不是首先为了工农而是为了这个特权等级。党员已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了。解放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入党呢？就是因为入党后吃得开。”

第二，石盘认为中共党内没有民主，毛泽东搞的是个人崇拜，《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什么新东西，喊个人万岁是不应当的。。石盘污蔑我国党内也存在个人崇拜，认为中国党不是集体领导，而是毛主席一个人领导。他说“党内缺乏民主，就是毛主席一个人说了算，我就是对毛主席有意见，今天反冒进，明天又反保守，反正说来说去都是他对。1952年毛泽东选集二卷出版前，为了作宣传，中宣部组织一些人写文章，当时分配我写‘矛盾论’，我研究了一个多月，结果还是没有写出来。我认为这篇文章和普通教科书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篇普普通通的文章，哪里有什么新东西，为什么要拿出来呢？这不是有意提高他的个人威信吗？我也反对每年那么多人特别是弄那么多小孩子在天安门前喊毛主席万岁。”我过天安门的时候，总是注意两旁的标语是写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还是毛主席万岁？我认为喊党万岁是可以的，但喊个人万岁是不应当的。”

第三，石盘反对过度地搞工业国防建设，反对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主张大力改善人民生活。石盘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政策。他说，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建设搞得太快了。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共产党进城后就应当首先考虑改善人民的生活。应当把工业化速度放慢些，农业投资增大些，现在又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应大力削减国防和行政费用，使人民生活能够得到一些改善。现在是特权等级的生活提得太高，工农生活改善得太慢。他还反对肃反、整风、反右派和干部下放等政策。第四，石盘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要应通过会议（似为“议会”）斗争，现在不必打破旧的国家机器。石盘在师大讲课时，脱离实际，教条主义很严重，讲课的内容主要引证经典著作。反对中央“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他用“联系实际不要庸俗”作借口反对改造思想。认为哲学不能当做政治课教，否则会降低学术价值。向学生介绍阅读哲学著作时，不介绍毛主席的著作，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什么新东西。平日讲课时还散布一些修正主义观点，如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主要的，因此只能强调团结，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要应通过会议斗争，现在不必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他崇拜黑格尔，在讲马克思的著

作时，常常对学生说，马克思的某某论点，黑格尔早讲过了。他在学生中散布“为理论而理论”的思想，他说，学习马列主义只要背熟基本经典著作就行了。回到1958年，石盘反对的这些观点都是毛泽东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救国救民的真理”，是“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是毛维护他的绝对权威的“命根子”。石盘当然是反动透顶，罪不容恕。但是反过来看，石盘可以称为“两头真”的干部，而且比后来称为“两头真”的人，最少超前了二三十年，他就看透了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的错误。这些观点在当时那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是狂人诳语，是疯人疯话，要在文革的大灾大难之后才逐渐被人认为是常识，是常理，是真理，因此石盘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无可争议无可怀疑的先知先觉者，大智大勇者。

新华社报道：在这次双反运动中学生们给石盘贴出了三百多张大字报，批评他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等。系党总支找他谈话，从谈话中，问题逐渐暴露。4月下旬，政治教育系连续召集会议，对石盘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揭发与批判。会后，系党总支几次找他谈话进一步暴露了他的问题。目前石盘仍坚持他的反动看法，态度极端顽固。他说：“我的问题在思想上已闷了好几年了，现在不讲也不行了。目前我的心情是豁出去了，我已有充分的准备。我的思想短期内是绝不能改变的。我的出路只有一条，砍脑袋或是去坐牢。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为任何别的出路都需要有个前提，那就是承认自己是错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又说，“假如不砍我脑袋，暂时又不要我坐牢，那么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保留着一条小命活着就是了。我要等一等，等它个十年、二十年，等到党内外有觉悟的人，起来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石盘现在每天关在房间里，不知作什么。他给他下放的爱人范中写信说，他不能放弃他的政治观点，他相信真理是在他这一边的。他说：“为真理受难而牺牲是光荣的。”系党总支曾问石盘：为什么他的问题过去在党内不谈，大鸣大放期间不谈而现在谈呢？他说，“现在不谈是不行了，你们老问我，我不谈怎么行呢？从前不谈是因为怕杀头。”在另一次谈话中他无意中说出：去年还不知怎么处理右派，我怎么敢谈呢？其实，此时已经处理了部分右派，“底线”就是一个不杀。这或许是石盘“现在敢谈”的原因，但是，作为三级教授，当时的工资将近300元，是极少数的特高薪阶层，几乎算是中国的特权阶层，相当于5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工资，可以维持8—10口的小康之家的还算不错的生活。反之，他如果把良知当狗屎，随波逐流，与世浮沉，给毛氏唱颂歌，功名利禄将源源而至。不知石盘是否会想到，这一“说”，说不定

“补课”就“补”进了右派队伍。至于三级教授，无论打不打右派都要完蛋。石盘犯了大傻，不知道“沉默是金”，他拒绝“在沉默中灭亡”，选择了“在沉默中爆发”：豁出去！师范大学对石盘的问题准备以系为主展开大批判，肃清石盘影响。石盘表示不愿在大会上报告自己的思想，他怕“感染”别人，他表示如果开大会他不吭气。五十四年后，我们来重读石盘的这些“反动观点”，觉得历史给中共开了一个大玩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不可亵渎的老师，历史是无情无义的法官，历史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真理。真理竟然是在石盘这一边。石盘如此凛然大义，坚守自信，毫不隐晦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迎来的第一个可能就是在整风补课中划为右派，然后在文革中遭到灭顶之灾。

新华社记者对石盘的记叙，比较客观平实，真实可信，因此使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一位坚持真理、追求真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勇士形象。《国际歌》唱道：“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可是从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直到每一个执掌权力的共产党领袖，他们都认为真理只掌握在他们一人之手，他们拥有真理的专利权解释权裁判权，谁要是表示怀疑、质疑、反对、挑战，那就要叫你“只有一条，砍脑袋或是去坐牢。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笔者再重复一遍：“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位石盘教授可谓名符其实的“大英雄”、“真名士”，令人肃然起敬！假若石盘健在，现在应该是96岁了。我估计他逃不脱文革关。如果石盘地下有灵，可以告慰他：“党内外有觉悟的人”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自由民主平等宪政这些普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遗憾的是我们仍然苟活在生存在一个同样的专制制度的天空之下，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呼吸…… 

【作者原注】本文所引石盘的文字，均出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盘借交心向党进攻》，用楷体字排列，未加引号。若有了解石盘的读者，请予补充。（此文摘自互联网，由安希孟先生推荐，谨此致谢）

## 【编读往来】

## 1. 樊能廷：致乔晞华（对《记忆》的意见）

在北大文革研究方面，《记忆》多年来严重倾向聂派，聂派可以逢稿必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2017年上半年，我被《记忆》压了七篇稿。当然，天无绝人之路，我在别处刊发，还出了书。最近的切身体会，是8月份我投三篇稿件，《记忆》在8月25日答复全给发。孰料他们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到9月5日改口说只给发《华北局》。一篇就一篇吧——至今（北京时间2019年11月24日星期天），我没有见到《记忆》刊发我文章，倒是见到读者吴兴月对我《华北局》的批评和横加挑剔。

实话说，靳枫毅这个人，我只知道他是北大井冈山的头头之一，迄今未曾谋面。他在北大打李雪峰风潮中起多大作用，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引证了他1967年的材料，给《记忆》投稿都附上扫描件了。吴兴月指责我出于派性掩盖靳枫毅的行为，又扯出李丹林如何如何，都是出自他的胸襟。我《华北局》一文，笔笔有出处，有历史文献为根据。吴兴月说的七七八八，没有出具任何文献根据。

用脚指头也能想明白，调动学生队伍，三番五次到天津追打李雪峰，车接车送，绝不是靳枫毅个人或他那个“延安战斗队”所能为。聂元梓掌权期间的北大，只许拥聂派说话，不许反对派说话。时移世易，今天这一套行不通了。我对我的任何文字负全部的责任，而且欢迎并诚恳接受摆事实（出言有据）、讲道理的批评意见。👍

2019年11月24日

## 方惜辰答樊能廷先生：

乔晞华先生转来大函，感谢您对本刊的关注。关于来信提的问题，兹复如下：

第一，来信说：“2017年上半年，我被《记忆》压了七篇稿。”本刊之所以压了您的大稿，是因为您2017年投给本刊的《北大文革期间学生对学生施酷刑二例》一文，不但严重失实，而且大量抄袭了《陈一谔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附录一）。对这一悖离学术道德的作法，您却“无愧于心”（附录二）。本刊人手有限，自从启之先生退隐之后，不得不外请编委。鉴于您的这种学风，编委对大稿不得不慎之又慎。您所说的“压稿不发”即缘于此。

第二，来信说：“8月份我投三篇稿件，《记忆》在8月25日答复全给发。孰料他们言而无信，出尔反尔。”需要说明的是，本刊说“全给发”有两个前提，一是大稿为原创，而不是抄袭的；二是大稿谈的是北大的文革，只能放到“北京高校文革专辑”之中。如前所述，要确定大稿是否原创，有待于编委拿出较长的时间考察。而要出一期高校专辑，则必须组织若干篇不同作者撰写的文章，其字数须达到七万字左右，这同样需要假以时日。

第三，来信指责本刊在未发大稿《华北局》之前，即发了读者吴兴月的来信。是因为，本刊曾事先征求过阁下的意见，阁下同意本刊将大稿发给相关人士。吴兴月先生对大稿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阁下之文“充满派性与攻击性语句”；二是阁下的“文风特点是真真假假混在一起”，“有许多不实之词”，“有时公然造假”；三是阁下引证的多是当年的派性资料。而这些资料正如阁下挖掘出来的《号外》一样，不足凭信。本刊认同上述三条，所以决定先发吴兴月的来信，以引起阁下的重视，如果阁下从此以后，改变自己的学风和文风，则善莫大焉；如果阁下把同道尖锐而坦诚的批评，视为“横加挑剔”，并坚持认为《华北局》一文，“笔笔有出处，有历史文献为根据。”那么，就请阁下对“吴兴月说的七七八八”，给予有理有据的反驳。如果阁下这两件事都不做，那么，本刊就将在随后的高校专辑上刊发阁下的《华北局》一文。将吴兴月的来信和阁下的稿子都作为文献资料留给历史和后人。

第四，本刊压了阁下的稿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稿引证多无出处。如本期发表的《北大文革“老佛爷”聂元梓》一文中，引了徐友渔的《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王学珍编印的《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等书。但是没有注明所引著作的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另如，此文提到工作队骨干阮铭的话（“北大干部只见过江隆基、陆平这样的共产党，没见过真共产党，是从一个资产阶级的被窝，滚到另一个资产阶级的被窝”。聂元梓说：“过去北大不是真共产党，现在才有了真共产党”。有的工作队员对北大党员说：“把一切倒过来看，才能革命，还把干部当书记，就揭发不出问题”。）而不注明这话从何处而来。刊发这种有违学术规范的文章，会有损于阁下的形象。

第五，即使大稿偶而提到引文的出处，其准确度和可靠性也有待提高。如《北大文革“老佛爷”聂元梓》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以上批评见1965年4月29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在社教工作队骨干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记录稿存于北京大学综合档案

馆。”这个出处不准确——北大有档案馆，但没有综合档案馆。而且北大档案馆有规定：凡是跟政治运动有关的都不准查阅。可以查阅的只是学籍记录等。也就是说，阁下要让这一出处有说服力，还得有进一步的说明和证据。

大函说：“《记忆》多年来严重倾向聂派，聂派可以逢稿必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本刊要告诉阁下，首先，这是您的一个误区，聂派的文章绝非您想像的那样“逢稿必发”——您不是本刊的编辑，怎么知道我们逢了哪些稿子？事实上，聂派的来稿，我们有很多没有刊发，只是阁下不知道而已。其次，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舒声、俞小平、张从等反聂派或者非聂派的文章我们也没少发。最后，我们要重申的是，本刊发稿的标准，不是看稿件来自哪一派，而是看它是否遵守学术规范，是否严肃认真地对待历史。

为了减少阁下对本刊“压稿不发”的怨怼，为了证明阁下“笔笔有出处”的真伪，为了体现阁下对自己的“任何文字负全部的责任”的胸襟，我们将在近期的“北京高校文革专辑”上刊发您惠赐本刊的不规范之文章，但希望阁下今后规范起来。🔒

方惜辰 2019年11月27日

## 附录一：章铎谈樊文的抄袭（摘录）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樊能廷的抄袭情况。（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将樊能廷文中属于《陈一谔回忆录》中的文字变为红色字体；在括号内的红字部分是陈一谔原文里的文字而被樊能廷改动的，如原文“我”被改为“陈一谔”或“他”等；所标页码均为《陈一谔回忆录》中的页码。）

1966年10月上旬陈一谔（我）外出大串联后回北大，发现学校（一扫）聂元梓“红色政权”当政以来的独霸局面被打破，一些学生（并）成立了反聂的“井冈山”、“红联军”，各种看法的大字报贴满燕园，他在校内（我）溜达了（几天）、观望了几天，又出去串联了一个月。再回北大时，“北航红旗”的几个人找到（我）陈一谔，要把他（我）“社教运动”中写的《意见书》印发传播。他（我）说：“现在大家都很狂热，这个东西如果传得太广，一旦到了江青手里，我就没命了！”这样，劝阻了（他们）“北航红旗”的人。（102页）

（原来，）中文系冯隆、郭庆山和张自修等几个有正义感的同学把陈一谔（我）写的《意见书》油印出来，以便为他伸张（我伸冤，他们是冯龙、郭庆山和张自修）。恰在这时，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写了批评林彪鼓吹“顶峰论”、“绝对化”的大字报，冯隆立即写大字报支持，大字报还没贴出（来），又被陈一谔（我）劝阻（了）。他（我）

悄悄（跟他）对冯隆说：“从林彪大谈政变到现在权势熏天，毛不支持，他怎么敢？千万不能往枪口上撞！”其实，当林彪“政变经”的讲话传出后，很多人都对（他）林彪讲话有看法、有微词。（北京各大学两派争论正酣，我就又去串联了。）（102页）

见北京各个大学两派围绕“工作组”和“资反路线”争论正酣，陈一谔就又外出串联了。这一回，他和几个同学（接着，我和几个同学应邀）去了大连，先到造出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的大连造船厂，又到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的大连机车车辆厂，看到这两个大工厂一闹（搞）文革，生产几乎陷于停顿。他们觉得这（我们一讨论，觉得这一类工厂的生产搞乱了，）对国家损失太大，决定发电报向周总理汇报。函电交驰，很快得到回音，说是2月2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我）们和工人代表。陈一谔他们（我们）兴冲冲回到北京，住在铁道部招待所，整理和准备给周总理的汇报材料。（102~103页）

1967年2月24日下午，陈一谔千不该万不该，给同学（我给）高运安打了个电话。两小时以后，同班同学、南通人氏黄介山带着高运安等五六个人，突然来铁道部招待所找（我）他。黄介山（皮笑肉不笑地）骗（我）他说：“系里辩论吕乃巖的问题，请你发言。”要（让我）陈一谔立即回校。陈一谔（我）说：“大连的事关系国计民生，明天给周总理汇报完，我马上回校。”黄介山（又骗我）继续骗他说：“晚上全系开会，就等你了。会开完你就回来。”陈一谔（我）看看高运安，高运安（他）似乎很（很害怕）惶遽，含含糊糊地（也）说：“你就回校一趟吧。”（103页）

不料，陈一谔听信黄介山此番谎言，从此落入网罗，坠入阿鼻地狱。

随同黄介山、高运安等人（我和他们）刚一走进南校门，不由分说，陈一谔就被两手倒架了起来，中文系的人（站在）布列在甬路两边，（高喊口号）呼号动地：“坚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一谔！”“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一谔！”“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陈一谔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还时不时）你一拳、我一脚（打人），不住气地殴打陈一谔，只要稍一挣扎，胳膊就被拧得更紧，路上围观的人也跟着喊口号。陈一谔（我）被押上了32（楼）斋中文系男生宿舍。楼梯两边站满了人，一边喊口号，一边打（我）他。进入楼道以后，两边的拳脚像冰雹（雨点）般砸（了）下（来），（拳脚相加地）把（我）陈一谔从楼梯这头打到那头，从那头又打到这头，直打了三个来回，打得（我）他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失去知觉，瘫倒在地。这是（我）陈一谔第一次被打得昏死过去。直到第二天下午醒来，从不省人事中醒来，陈一谔（我）全身疼痛，动弹不得。他（我）强烈抗议遭受到的这种法西斯暴行，要求见聂元梓，并宣布绝食。（103页）

绝食的第二天，中文系领导华秀珠来看（我）他，华秀珠态度和蔼，她（人很善良，原）曾经是上海纱厂的女童工，陈一谔感谢她的好语如珠。但是，陈一谔坚决（我）表示：“聂元梓不来不复食。”绝食第三天下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之一、

校文革办公室主任夏剑勇来了，他说：“聂元梓同志很关心你，担心你身体出问题，特别委托我来看你。不要绝食了，有话慢慢讲。”陈一谔有声无气地说（我表示）：“黄介山这种做法完全违背《十六条》，要允许申辩、允许看大字报、允许读报纸。”夏剑勇（他）都答应了，还让人端来一碗米汤，看着陈一谔喝完才走。（103页）

陈一谔又躺了两天，（我才能）勉强下床。他走出楼外，看见黄介山、任喜贵署名的大字报，题目是“死鬼陈一谔又活了！”陈一谔心里咯噔一下（我心想）：他们怎么会变得如此没有人性呢？岂不知，（原来）聂元梓校文革借批“反中央文革”和“二月逆流”之机，把“井冈山”、“红联军”打成了“反动组织”，又在反对她的师生中大抓“反革命”，搞得北大到处在抓人、斗人，学校呈现出（十分）一片森严恐怖的局面。（103页）

文革初期乘势而起的这个黄介山借机，借北大“红色恐怖”之势，把反对校文革聂元梓、系文革吕乃巖的冯隆等五个人打成了“222反革命集团”，（只不过这几个同学经常在32楼222房间讨论问题。）凭借着把自己同班同学打成“反革命分子”的赫赫之功，（以把自己的同学打成“反革命”的功劳）黄介山当上了刚成立的“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从铁道部招待所诓骗陈一谔回校前，（因为）冯隆等人支持高运安揭发文革主任吕乃巖的一系些问题，（黄介山骗我回校前）高运安已被打成“反革命嫌疑分子”，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我），陈一谔被押着上厕所，看见冯隆被剃光了头在扫厕所，（但眼神并无惧色。）冯隆神态坦然，眼神的表露毫无惧色。（103~104页）

1967年3月初，“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连续两次组织人马批斗（我）陈一谔，仍是驾着“喷气式”，边喊口号，（边坐飞机，）边对他连踢带打，让（我）陈一谔揭发冯隆“反江青”、“反林彪”的罪行。陈一谔明瞭，（知道）冯隆去年7月、11月先后写过不同意江青、林彪言论的大字报（的人很少，因为并没有贴出。），都没有贴出，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揭发（他）冯隆的人很可能（出于政治压力下的恐惧，）恐懼于政治压力，那么，冯隆若承认了，肯定已经斗得很惨。在大环境不实事求是的情况下，如果（我若如实）陈一谔说出冯隆写过林彪、江青大字报的真相，（冯龙岂不真的成了“反革命”？）等于是落井下石。陈一谔（我）一口咬定没这个事（打得再惨也不松口。）任凭拷打，也不松口。（104页）

陈一谔（我）的“顽固”使黄介山气急败坏，指挥“新北大公社红七团”（强行抄走了我）抄掠了陈一谔所有的东西，用以凑集把他（我）打成反革命的材料。黄介山等人从他（我）的日记、读书笔记和来往信件中，先后摘录并印发了三批《反革命分子陈一谔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材料。1967年3月上旬，（三月上旬）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和中文系文革、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把陈一谔“开除党籍和学籍”的声明。<sup>1</sup>（注：此处加粗的红字，是樊能廷唯一一处说明

<sup>1</sup>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陈一谔回忆录》，2013年5月，104页。三月上旬，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和中文系文革、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把我“开除党籍和学籍”的声明。

其文字来源于《陈一谔回忆录》）（104页）

（1967年）3月17日下午（1点），陈一谔（我）被八个人从32（楼）斋押到第二教室楼，脖子上挂了一个沉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谔”的牌子，两个彪形大汉反剪（我）他的双臂，让（我坐着飞机）他“坐飞机”，连踢带打把（我）他押入了102教室。（500人的）大教室坐满了中文系师生，由任喜贵带领着高喊：“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谔”、“谁反对聂元梓就打倒谁”、“陈一谔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各种打倒我的）口号。（104页）

黄介山主持会议，（恶狠狠）杀气腾腾地讲了几句上纲上线的话，走过来揪住陈一谔（我）的头发让（我）他“认罪”，（我）他刚说了一句：“我没罪！”就遭到一阵毒打。接着，新北大公社的骨干轮番揭发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江青同志”、“恶毒攻击活学活用”、“恶毒攻击反右派”、“恶毒攻击反右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聂元梓和新北大红色政权”的罪行，（我“恶毒攻击”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江青同志、活学活用、反右派、反右倾、不民主、社会主义、聂元梓和新北大红色政权的罪行，）说几句就打一顿，头发一缕一缕揪下来，汗水和血水染湿了地面。（104页）

刚开始，陈一谔（我）还能有些反抗，高喊着：“党员向党中央反映意见何罪之有！”“你们实行法西斯专政！”“聂元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思想一定会照亮新北大！”……但（16）十六个人分（4）四组轮换，不断地把陈一谔（将我）倒架双臂、压弯上身、揪住头发、仰头向上，还不断殴打、脚踢，四（4）个小时的酷刑折磨，使（我）他渐渐失去了知觉。恍惚中，凶悍的马西沙大喝一声，把（我）陈一谔右臂给拧断了，任喜贵又（用腿）把（我）他左肋骨踢断（了）。陈一谔（我）瘫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这是陈一谔第二次被打昏死。（105页）

昏死中他（昏迷中我）被几条大汉架出会堂，倒拖着拉到32（楼）斋，扔到了宿舍的床上。陈一谔依稀中感到自己还有一丝游息，只要停止呼吸就可以死去。活着是那么艰难，死却非常容易。人一死也就一了百了，可是又怎么能就这么死去呢！在大家的心目（眼）中，在战场上牺牲是个英雄，在刑场上就义是个烈士，自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算个什么？何况还要背上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太不甘心了，不能死。（105页）

混沌中，似乎听到楼下高喊“沈达力畏罪自杀，罪该万死”的口号，陈一谔心中吃了一惊。再细听，果然是知心女友沈达力自杀了(?)！他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动弹不得，泪水从眼角不由自主流了出来，不觉(我)又昏迷过去。陈一谔再次醒来，脑子里不断闪烁着古人受苦受难不屈不挠的画面，忍着浑身剧痛驰想，（“）上天让人类降生了，上天让人类受苦了，上天让人类死去了，这就是历史。（”）但（我）陈一谔不能死，不

能枉作游魂，有一口气就要坚强地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含污忍垢也要活着，活下来才能给沈达力、给自己洗刷清白，活下来才能最终伸张正义，活下来才有实现报国夙愿（理想）的机会。朦胧中陈一谔想起1960年在广州，父亲教给（我）他的“龟息功”和（“瑜伽功”）“不终之药”，舌上放一粒米顶在上颚，吸气到丹田循环运行而不呼出，这样（7）七口水米不沾仍可维持生命。他试着做，（我试着做起来，）做着做着，就又昏迷过去了。（105页）

这样，陈一谔（我）在床上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时，看见同屋的高运安、朱殿庆、刘镇伟、张崇巖都眼睛红红地看着（我）他。刘镇伟说：“我们都以为你活不过来了！”张崇巖端过一碗粥说：“喝点吧！”朱殿庆（则）愤愤地痛骂了一句：“真他妈的法西斯！”流下了热泪。（我）陈一谔想上厕所，高运安赶忙把（我）他扶起来，全身疼痛的得无以（不堪）忍受，拧断的右臂肿胀、不能动，左肋也（疼的更厉害了）奇疼无比。（我）他的脚刚一踩到地上，又疼（的）得缩了回去。才知道，（原来）把（我）陈一谔从第二教室楼批斗会现场拖回宿舍的时候，脚趾头和鞋袜都磨破了，血肉、泥土和鞋袜粘在了一起，（实在疼痛难忍。）疼痛钻心。高运安扶着（我）陈一谔，一步一步挪地，到了厕所，（尿里）尿出的（竟）都是红黑色的血尿。后来医生告诉（我）陈一谔，是右肾被踢坏了。回到房间，陈一谔左手按着左肋，往床上一躺，又是钻心的痛，医生检查说是左肋被踢断了四根肋骨。（105页）

正（真）应了泰戈尔所说（：）“人一旦变成兽，一定比兽更凶残”的箴言。多年以后，几个老同学说起“3·17”批斗（我）陈一谔的场景，（一致）不约而同都说那是他们参加过的“北大最残酷的批斗会”。2006年，（我）陈一谔的胳膊和腿脚突然先后不能动了，中国科学院顾问郭德纯医生给（我）他诊治时说：“你四十（40）年前，身上留下了十几处断伤和瘀伤，能活下来真是奇迹！”（105页）

从1966年12月聂元梓借着批判“反中央文革歪风”（大整反对派开始，），肃整反对派，假（到）“反二月逆流”之名，狠斗各系对她有异议的师生，（终于在）北大出现了“红色恐怖”的一统局面。这期间北大被整肃、批斗、抄家、殴打、伤残、自杀、冤死的人真是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更是无人幸免侮辱，）像沈达力（这样）这种红颜薄命、被迫害致死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罢了。放眼（那时，）全国，被逼被整至死的冤魂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108页）

聂元梓（因被）是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作者，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她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之初，师生们还对她寄予希望。但她很快就头脑膨胀、忘乎所以，对持不同意见的师生排斥打击，甚至（制造出）弄出“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聂即反动”的逻辑，借口“反二月逆流”，把批评她的“井冈山”、“红联军”打成“反动组织”，残酷（斗争。）迫害，在北大师生员工中广招仇怨。（108页）

当时，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一批“极左派”在校园里为所欲为，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持异议者随意抄家、搜集材料，而后批斗、殴打，以酷刑迫其认罪。昔日（连）聂元梓的“战友”孔繁、杨克明、郭罗基、张侠、杨勋等人给她提意见，也被指（认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阴谋家”、“野心家”，遭批判、殴打，甚至送进监狱。几乎各系都在师生中不断抓出各种“反革命分子”，（搞得多数人心惊胆战），、“反革命集团”，搞得人人畏忌，敢怒而不敢言。（108页）

中文系在系文革主任吕乃巖（操纵）掌控下，“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更是无法无天随意批斗不附己意的人，在各个年级乱抓“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集团”。人们见到他，都（既）噤若寒蝉，（又侧目而视）道路侧目。（108页）

陈一谔（我）被押回北大后，开始的几次批斗会，主要目的是为核实他（我）反对毛主席、林彪、江青的材料。陈一谔（经我）矢口否认（后），吕乃巖、黄介山等人一时还凑不够将（我）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证”，而“3·17”批斗会，是要搞臭（我）他、孤立（我，）他、肉体上摧垮他，（以起）杀鸡儆猴（之效）。陈一谔（我）若“低头认罪”，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也只有对抗到底才有活路。“新北大公社红七团”（他们）声言要将（我）陈一谔送交公安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我）表示“欢迎，可以少挨打了”，但却不见（回音）下文；又说要将（我）他送交校文革“劳改队”（俗称“牛棚”），也没有了下文；对（我）他实行“强制劳改”，他（我）硬是一天都不去。（108~109页）

系里不少人被迫去“劳改”，而（我）陈一谔这个“最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却一天也没有去。于是，“新北大公社红七团”（他们）就用轮番批斗折磨（我）他，企图让（我）他从肉体到精神都垮掉。他（小到我）的一言一语，（他们都会批斗一场，）都会招致批斗，陪斗更是家常便饭。任何“把柄”都会拿来大作文章，陈一谔（我）看《三国演义》，被指为说我“寻找对付革命人民的阴谋诡计”，斗一场；看《红楼梦》，说（我）他“对封建贵族情有独钟”，再斗一场；他（我）有一本《圣经》，就说（我）他是“真基督教、假共产党”，又斗一场（；）……（。）就这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陈一谔（我）先后被批斗了一百多（次）场，有时一天一（次）场，有时一天两场，甚至三场。（有时一天两、三次。）（109页）

1967年4月份，（第三次把我打的昏死过去的一场批斗，）是（新北大公社）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等人（要组织）煽动、组织新北大公社人马冲击公安部<sup>1</sup>，陈一

<sup>1</sup>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聂元梓回忆录》，2005年1月，207页。孙蓬一在大会上讲话，我心里急的不得了，我又不能当众制止他讲下去。我就给他递条子，要他别讲下去了，连递了三次纸条，他都没有理睬。结果呢，孙蓬一的讲话把学生们的情绪煽动起来，学生们当天晚上就上街了，贴了很多反对谢富治的标语，还有一批学生到公安部去，要揪谢富治。我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再派学生出去，把那些反谢富治的标语覆盖起来。这样，一批学生在前面张贴反谢富治的标语，另一批学生就在后面把他们刚刚贴出的标语覆盖了。同时我派一些人到公安部门口去，把揪谢富治的学生都拦截回来，尽量缩小影响。

谔（我）说：“这么做是犯罪行为！”他立即被黄介山等人，给挂上大牌子、戴上高帽子，押到大饭厅批斗，而后又全校“游斗”，一边（呼）喊口号：“坚决打倒恶毒攻击新北大红色政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边听任众人你一拳我一脚打个没完。半天下来，他（我）又气息奄奄地被扔到床上，几天都动弹不得。这是陈一谔第三次被打昏死过去。……（109页）

陈一谔（我）拒绝参加（所谓的）令人作呕的“早请示，晚汇报”，并且说：“我们又不是宗教，干吗搞这一套！”又（是）遭到一场接一场的批斗。事后，他（我）倒（觉得）奇怪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全国都成了红海洋，人人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到处都在“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只有他（我）这个“傻子”，宁可皮肉受苦，也不做这些（违心）应时权变之事。（我）陈一谔（很为自己文革中没参加过这类群氓活动而感到自豪。）很自豪自己文革中没参加过这类群氓活动。（109页）

不难看出，樊能廷所写的关于陈一谔被批斗的情况，基本上是抄袭了陈一谔的回忆录。现在回顾、反思、研究北大文革，如果大家都像樊能廷博士这样去抄摘别人的文字，改头换面后变作自己的文字发表，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引自电子版《北京大学文革史权》第二卷，专题部分，第401--407页

## 【附录二】樊能廷答章铎

读了转来的章铎意见信。陈一谔是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中出力甚巨的人物，或者说也是北大老五届中，对于改革作出数一数二重大贡献的人。我虽与他在北大不同系，不是他的文革经历的“亲历者”，但作为朋友（他在《回忆录》122页中引我为友），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的知情者。陈一谔在文革中受过残酷迫害，我的小说，讲述1967年春天这一段，当然以他自己的回忆文字为依据。章铎的意见信，适足证明我没有编造任何一点事实。对于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既不夸大，也不无中生有，点了一些仗势作恶的人名。我无愧于心，自认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亡友。

也许当年的校友更应该反思：仗势作恶、绑架、刑求、武斗、杀人为什么会出在当年北大这样“高等学府”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组织”中？为什么同窗学子竟能下得了如此毒手？

引自电子版《北京大学文革史权》第二卷，专题部分，第409页

## 2. 魏明：对《记忆》266期读者吴兴月来信的疑问

读了贵刊266期读者吴兴月的来信，有两点疑问。一是贵刊还未刊登樊能廷先生《北大校文革地下常委》和《聂元梓打李雪峰》的文章，怎么吴兴月就写出读者来信了呢？按理应该是先刊登文章，读者看到后才能写出来信，是否程序搞反了呢？二是吴兴月是什么人？他怎么能够提前看到贵刊的未发稿件？如果他是贵刊编辑，提前看到可以理解，编辑可以给作者提出修改意见，而不能以读者名义写信吧？如果是其他人，则不应提前看到来稿，这应该是刊物的制度和作者的尊重。

以上疑问，请贵刊解释一下，如果做错了，请在下期刊物上做出检讨，并避免再发生类似问题。 

### 方惜辰答魏明先生：

兹将来信所提疑问，答复如下：

一、来信质疑本刊是否把程序搞反了。上面的“方惜辰答樊能廷先生”之三，已经把事情说得清楚。

二、来信问“吴兴月是什么人？”本刊如实相告，“吴兴月”与自称“魏明”的您一样，都是作者的笔名。用笔名发表言论文字，既是公法，也是私权。无论是谁，要追问“魏明”或“吴兴月”的本名及其它情况，本刊都无可奉告。

三、来信问本刊：“如果做错了，请在下期刊物上做出检讨，并避免再发生类似问题。”本刊请阁下明示，在这件事上，我们应该检讨什么？ 

2019年11月28日

##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方惜辰